

中国人眼中的德国

对德中关系的认知、评价和期待

调研报告, 2025年10月

本译文仅供参考, 如有任何异议, 请以德文原文为准。



目 录

前言	01
引言	04
概览	07
1 德国对中国的印象与中国的自我认知	13
2 德国形象光辉不再	23
3 德中关系	32
4 动荡中的全球秩序	40
5 呼吁“理性”合作	50
总结与展望	60
调研方法	64
受访者	66
出版说明	68

前言



近年来，中国作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日益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推进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的战略目标。

当前，北京做出的战略决策受到德国的极大关注。有人表示钦佩，有人感到害怕，人们担心对这个重量级经济体的依赖正在加深。这个经济巨人并不符合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宪政模式，因此经常被视为制度性对手。

不可否认，中德两国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为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例如，德国汽车行业受益于能进入中国这一爆炸性增长的市场，享受着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为其提供的发展机遇。凭借良好品牌声誉、精湛工艺形象和世界领先的尖端技术，德国产品在中国的成长空间似乎还可以更大。

在经历了对中国发展的普遍狂热之后，近几年来人们开始逐渐清醒过来，对这个昔日被如此看重的贸易伙伴的依赖让人们感到失望和担忧。今天，德国对中国及其政府的看法被浓缩为两个关键词：一是“三重定位”，即“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二是政策口号“去风险化”。在德国的政治辩论中，几乎每天都会提到中国以及我们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关系。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对这个国家、它的人民和它的政治雄心的看法是切实可靠的。其中大部分看法是正确的，有些是夸张的，或者可能是错误的。这些认知在德国形成了一种对政治和经济影响巨大的中国形象。

与此同时，这几个问题又常常被忽略：中国人如何看待我们德国？他们对德国和德国人有什么样的期望、态度或见解？

疫情前两国之间的交流很活跃，但与疫情相关的隔离措施可谓是德中合作和对话的转折点。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接触几乎完全停止了。这种伤痕至今仍在产生影响，大大削弱了人们的彼此理解。因此，让在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发表意见，了解他们对德国的看法和见解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中国人眼中的德国》调研报告汇总并整理了这些声音，旨在帮助读者从中国自身的逻辑出发，更好地理解中国。2025年夏天，我们在中国开展了45次深度访谈，受访者均为中国人，他们来自政界、经济、民间社会和媒体等不同领域。这些访谈提供了对下述关键问题的见解：中国如何看待今天的德国——从经济、政治和历史维度来探讨？对德国的期待、担忧或希望是什么？德国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是否相信欧洲有独立行动的能力？

本调研报告揭示了德中关系中的多重张力：在适应与划界之间、在战略理性与情绪碰撞之间、在官方叙事与个人认知之间。调研报告表明，中国内部对德国的看法是多样化的。

概括来说，在许多受访者眼中，德国仍然是一个他们所向往的，充满美好愿望和希望的国家。但他们也认为，德国需要提高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在各方面继续努力保持与中国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继续被视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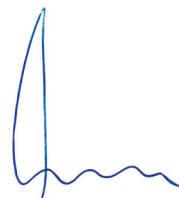
本调研报告旨在使德国的中国能力重新切合中国的现状。介绍中国受访者的看法和观点不是为了无条件地采纳，而是为了深入理解。只有理解中国行动逻辑背后的观点和动机，我们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具有前瞻性和韧性的战略。只有当我们能够在这种背景下明确自身利益时，才能够制定出与中国合作的合理提议——或者必要时，划定界限。两者都需要事先对中国立场进行去伪存真的全面了解。积极倾听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采取切实可行和有政治远见举措的先决条件，因此，本调研报告面向所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读者。

埃施博恩和北京，2025年10月



Thorsten Schäfer-Gümbel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董事会主席



Martin Hansen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东亚区首席代表

引言



在德中关系看法的调研报告不仅是一项学术活动，更是一种多方面的挑战。

有关欧洲应采用何种方式来正确与中国相处的争论相当激烈且变得越来越情绪化。这种争论呈现出泛化和极化两种趋势，意见往往很快凝结成定论。任何直言不讳的人都有被夹在两者之间的风险：被嘲笑为天真无知，被怀疑在淡化风险或被误解为妖魔化中国。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和相互摩擦猜忌的时代，努力理解彼此的观点尤为重要。因此，《中国人眼中的德国》这一调研报告旨在尽可能多地获取不同中国人对德国和德中关系的看法，努力倾听日常官方言论之外的声音。除此之外，报告还尽可能重构了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所采用的更深层次的表述和解释模式，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解释。这种认知研究不满足于单纯的归因，而是试着去探寻其中隐含的诠释模式、文化背景和基于经验的思维视野，以打开通向受访者思想和感受深处的大门。这不但使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受访者对德国的看法，而且至少也可部分地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看待德国，哪些经历、文化印记、期望或历史解读对他们的感知产生影响。在两国政治和社会疏远的当下，这种重构性的观点应为外交表层之外的相互理解创造空间，有助于消除埋在人们心头的芥蒂，建立鼓舞人心的沟通桥梁。当然，调研报告本身不会去核查受访者所表述的认知的真实性，也不会以评判的方式将他们的观点纳入政治辩论和当前与中国的争端中。上述两点将留待报告发表后的跟进讨论和研究来完成。

在目前这种动荡时期对他人观点保持开放态度就必须面对正当性压力。要去倾听来自一个越来越被视为“制度性对手”的国家的观点时尤为如此。

然而，要想真正理解你所面临的风险，你就必须弄清楚风险因何而来，如何被感知和可能出现的转变，而不只是简单地将这种风险罗列出来。因为不是所有存在的风险都会显现出来，并非每一种担忧都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每一种事态发展都是不可避免的。关系是在互动中创建的，如何发展与中国的关係不仅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欧洲，取决于欧洲自己的行为、态度及差异化认知和应对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在与安全相关的机构内部，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具有深远洞察力的风险管理并不是简单地划一个界限。风险管理也包括允许知情观察，在专业框架下进行对话，与不以官方口径发声并在谈话中表达自己经历、情感和疑虑的人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毕竟，屏蔽某些感知渠道也会带来风险，例如无视局势升级的信号、误解文化密码或错失缓和局势的机会。

因此，本调研报告并非要淡化现有风险，而是试图了解甚至深入理解中国人的观点和视角。如果真想知道对方的实际想法、恐惧或希望，你就必须学会倾听。这倒不是要使自己“迷途知返”，而是为了能够做出更切合实际的明智决定。

本调研报告呈献给所有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信念，愿意进入45位中国受访者内心思想和情感世界的读者。它不包含确凿的真

引言

理，只记录了受访者的观点和视角，这些观点和视角中有些与官方立场一致，有些是自我批判性的，有些还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对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叙事近似于官方路线，另一些则偏离了官方路线或在更高层面上对官方路线进行了反思。

很难明确界定受访者的陈述是出于内心还是由官方路线派生出来抑或是不得已而作的官方叙事的复制品。但无论如何，访谈结果构成了一个共鸣空间，汇集了中国众多相关人士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将影

响中国与欧洲和德国的合作。任何忽视这些声音的人都会面临盲点的风险。那些认真对待它的人可能会获得新的见解和视角及意想不到的选择，并对一个将对欧洲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参与者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个明智的中国战略需要两者兼而有之，即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和警觉的观察者视角。结构性谨慎和基于认知的开放并不矛盾，而是不可或缺的韧性的两个方面。本研究报告旨在为此做出贡献。

重要说明：本调研报告主体部分介绍的陈述并不代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或研究报告作者的意见。在编写本调研报告的过程中，作者按照采访记录最大程度地忠实再现了受访者的陈述，仅对采访内容按主题进行了分类，归纳成相应的题组并加上标题，在某些情况下作者对部分内容作了浓缩提炼处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作者所加的解释、补充或分类。按照质性研究的逻辑，本调研报告在统计上也不能代表所有中国人。参加本次调研的 45 名中国受访者来自北京和上海，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满足受访对象须与德国有相应关联的要求，并愿意与我们开诚布公地交谈。从质性研究的意义上来说，访谈所获得的核心陈述内容代表了这一社会群体的声音。

祝您阅读愉快！

作者：米沙·斯克瑞博特 (Mischa Skribot)，克里斯托夫·拜尔 (Christoph Beier)
2025 年 9 月于维也纳和波恩

概 览

概 览

本次调研的目的是在地缘政治发生剧变和动荡的大背景下来收集中国人对当今德国的认知和评价，尽可能真实地呈现这些观点，解读这些观点背后所蕴含的叙事模式，并将这些观点呈现给感兴趣的公众。呈现这些观点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人对德国的看法。评估中国人的看法、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核或将其纳入当前政治辩论显然不是本次研究的任务，这些都将留给后续要开展的研究和讨论来完成。

在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质性重构的研究路径，对由在华德国机构推荐的 45 名中国人士进行了半结构化、半叙事性的深度访谈。这 45 位受访者均具有扎实的德国经历，分别来自政界、科研、经济、传媒、民间组织和文化等领域。面对面访谈于 2025 年 5 月至 6 月在北京和上海举行。在数据整理和评估过程中，我们对提取的 1200 条核心陈述进行了编码和多层次的解析处理。

访谈最重要的结果如下：

1. 德国对中国的印象与中国的自我认知

受访者对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提出批评，在他们看来，这种形象往往显得狭隘、偏见且缺乏个人亲身体验。他们认为，这种对中国的印象往往只停留在人权或监控等消极方面，而对中国在消除贫困中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所面临的特殊挑战、中国的文化多样性及日常生活却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对外宣传沟通也被认为是不足的。中国形象的变化主要缘于紧张的地缘

政治局势。因此，双方更加需要相互尊重、正常化和平等的交流沟通。

中国自视是一个具有爱好和平，注重和谐、稳定和关爱传统文化的国度。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行事更为间接、注重关系和集体。西方伙伴很难理解这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中国，公开批评和有争议的辩论还没有成为习惯，言论自由或多神性等主题在中国扮演着不同于西方的角色，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常会产生误解。

西方的概念和方案无法直接照搬到中国。在中国，安全、稳定和社会发展是首要任务。受访者认为与西方国家的对话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指出西方国家常把对话道德化或政治工具化。

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复杂，具有多维性，这一点在西方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并不将自己视为一个经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具有自身逻辑的社会领导机构。权力不仅在中央行使，而且也在地方层面进行磋商。关于监控和缺乏透明度的批评声音确实存在，但这种批评声音往往出于对体制的忠诚，甚至伴随着新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所取得成就的认可。中国共产党经常被誉为善于学习，讲究实效。政治参与以巧妙的方式进行，例如通过地方倡议、非官方的影响，以及战略上允许的自由空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国际上对中国的看法往往显得说教式和简单化。改革当然需要，但应该从内部开始。

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成功，但也还存在不平衡的状况和潜在的危险。经济

的腾飞是全社会努力的结果，但也带来了社会紧张、心理压力和质量问题。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巨大的社会鸿沟，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距。

中国不追求世界政治霸权，而专注于内部的稳定和繁荣以及文化独立性。受访者批判性地回顾了中国的发展历程，但同时也对此充满自豪，并希望外界认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正当选择。

2. 德国形象光辉不再

德国在中国一直享有很好的声誉，特别是在技术能力、严谨程度和文化底蕴等方面。但受访者也发现了一些变化，许多人认为德国目前的文化转变、官僚主义障碍和政局动荡给曾经几乎完美无缺的德国形象蒙上了阴影。例如，人们感到德国现在可信度在降低，外交政策充满道德情绪，政治抱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鉴于在德国所接受的教育、德国的历史和个人在德国的经历，受访者与德国依然保留着很强的情感联系，希望两国能平等交流，相互学习。

德国的精准严谨、卓越的工业和优质的工艺依然备受推崇。双元制培训、中小企业的创新实力（“隐形冠军”）和弗劳恩霍夫及马克斯·普朗克等成绩卓著的研究机构被认为是典范。不少受访者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和反思历史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赢得了道义上的声誉。另一方面，德国也被认为是官僚主义泛滥，数字化落后，对创新不太友好，行政系统缓慢且繁琐。许多受访者还认为德国的日常生活也太麻烦，缺乏服务意

识。昔日以高效和社会流动性而闻名于世的声望已消失殆尽。德国越来越像一个停滞不前的体系，死守着已过时的结构，不愿迎接新的变化和挑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德国政治显得支离破碎，充满意识形态，缺少连贯一致的战略。例如德国的弃核和移民政策常被认为不务实，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德国仍然被视为是主导欧洲的天然大国。然而，以往的主导地位（例如默克尔执政时期）似乎已被削弱。现在的德国被认为是犹豫不决、刻意追求共识且在战略上优柔寡断。许多受访者希望德国能出台更清晰的政策，展示更强的领导意志，在地缘政治中（尤其是在欧洲背景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受访者认为德国是中国通往欧盟的重要桥梁，但德国没有积极发挥作用。尽管存在结构性障碍，受访者还是期望德国能发挥负责任和引领性作用。

3. 德中关系

尽管对德国表示高度赞赏，但受访者大部分都提到了两国日益疏远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虽然仍旧保持稳定，但双方的互信和已建立的对话机制似乎已被削弱。许多受访者还将这一发展趋势归因于美国的影响，并希望欧洲能有更多的独立性。

与德国的竞争被认为是激烈的，但基本上是公平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补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合法手段，把西方国家对中国补贴

概览

的批评看作是双重标准的表现。人们承认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缺陷，但认为这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中国的竞争优势不是因为其采取了不公平的做法，而在于其展示出的高效、速度和客户至上意识。德国关于公平竞争的讨论有时被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故意阻碍中国公司的商业发展步伐。受访者经常提到德中双方互补的潜力，例如在绿色技术或交通出行等领域，并希望以务实的方法来应对竞争关系。

德国的工业优势（例如在机械制造、汽车工业或医疗技术等方面）继续受到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受访者认为德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和数字化等未来相关领域相对落后。特别是实施过程缓慢，缺乏冒险精神和客户至上意识。与中国的速度和成本优势相比，德国往日那种靠工艺精良和质量保障的成功发展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德国错过了数字化转型，这削弱了德国的创新实力和国际知名度。不少人认为与中国的合作是一个机会，他们期待德国能够展示出更多的勇气和适应能力。

大多数受访者坚决拒绝“制度性对手”一词，在他们看来，这一概念具有对抗性、充满意识形态色彩，并且有损信任。欧洲的新说辞（尤其是当它以一种会影响公众观点的方式表达时）往往被认为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与事实不符。“去风险”一词在经济、研究领域或民间社会的泛滥应用也引发了困惑和不信任。许多人怀疑这是一种保护主义倾向，而不是在预防性地使风险最小化。在这方面，美国经常被认为是德国战略调整背后的推手。需要冷静对待各自的制度差异，不能以道德绑架的方式来处理制度差异。一

些受访者认为，欧洲具有对抗性的新说辞已造成不良后果：合作项目被搁置，信任在丧失，交流被中断。

4. 动荡中的全球秩序

受访者在访谈时一再强调，中国特别希望建立一个多极化、和平的国际秩序。中国愿意在这一国际秩序中发挥建设性而非霸权式的作用。面对目前被认为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受访者明确呼吁建立真正的多边主义，同时对世贸组织和联合国等现有机构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正当的，坚决拒绝了西方将其视为威胁或零和博弈的说法。

受访者原则上视欧洲为合作伙伴，特别是如果欧洲在外交上能保持其独立性。中国人眼中的愿景是：建立一个差异不会导致隔阂，而是激励相互学习且具有包容性和自我适应能力的秩序，即一种平等合作的体系，而非对抗性的霸权逻辑。

中国认为其国际参与是和平、以发展为导向和反霸权的，强调不干涉、公平伙伴关系和互利共赢的理念（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打交道时）。西方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例如军事干预或民主输出）遭到了受访者的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参与者，中国的知名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中国不是为了谋取主宰地位，而是希望建立一种以尊重和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平衡。

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是中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世界上横行霸道，对国际秩序影响很大，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主要

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政治议程设定和机构主导为基础。受访者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特别的批评：制裁、技术限制和对第三国进行政治施压被认为是蓄意对华打压。与此同时，受访者对美国文化、教育和创新所展现的魅力又表示认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中美冲突不是出于文化动机，而是地缘政治因素。在许多受访者看来，美国是全球稳定的主要破坏因素，而中国则是合作的另一极。

大部分中国受访者务实地将俄罗斯视为地缘政治平衡中的战略伙伴，但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盟友。这种合作基于共同利益，例如在应对西方压力方面。采访过程中，很少有中国受访者公开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行为作辩护，但也几乎听不到批评的声音。受访者没有表明自己的明确立场，只是呼吁缓和局势，实现各方的安定。

5. 呼吁“理性”合作

采访中受访者认为德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稳定、相互尊重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德国仍然被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早期的技术转让已日益转变为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德在数字化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相互竞争，但也具有互补的优势。受访者普遍认为，双方的未来在务实的战略合作、全球市场以及绿色科技和生命科学等领域。

中方强调文化交流是互信和理解的重要桥梁，尤其是在政治关系紧张时期。艺术、音乐、体育交流和人员往来可以增强情感联络，消除既有的偏见，尤其是在年轻人之间

的交往。但与此同时，受访者也发现文化交流机制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许多项目靠个人关系支撑，缺乏机制保障。双方的交流也受到签证限制、政治两极分化和媒体歪曲的阻碍。受访者希望，开放、直接接触和长远规划的合作项目能够开创超越意识形态的新局面。

受访者还强调，教育和科研是双边关系的支柱——尽管越来越多的障碍限制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潜力。德国被认为是一片有吸引力的教育培训沃土，特别是因为其很高的学术质量以及免费的就学制度。与此同时，签证、官僚主义和政治不作为方面的问题凸显。例如，医学、自然科学或法律领域的研究伙伴关系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但受到了由安全政策驱动的限制。德国退出某些合作项目被视为是双方的损失。相互学习的愿望仍然强烈。受访者认为，德国也可向中国学习——例如在数字化等领域。

中国非常重视环境和气候保护，但其背景不同于德国。经济稳定是优先事项，生态措施主要是出于功能而不是道德上的需要。德国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其在水处理、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技术专长尤为值得称道。与德国的交流仍然被认为是富有成效的，但必须建立在伙伴关系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基础上。双方需要共同采取以技术、融资、相互学习为重点的务实“绿色转型”方法。

在全球南方，德国和中国奉行不同的战略，但目标基本一致。德国注重标准规范、改善条件和长期规划模式，而中国则更加灵活、务实和基于经验。德国的发展合作因其

概览

专业性而受到认可，但同时又被认为较为高傲冷漠，监管过度和高度道德化。与西方模式不同，中国则强调伙伴关系、试点项目和本地化学习。受访者认为，与德国开展联合项目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由于方法上的差异，迄今为止都失败了。尽管存在诸多不同，但双方需超越地缘政治的竞争，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

原则上，中方认为务实、解决问题为导向和无意识形态的合作尤其富有成效。诸如德国的严谨认真和中国的灵活多样之间的差异被认为是可以克服的。可持续的合作需要社会各阶层的持续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只在政府层面开展，而且也应在文化、教育界和民间社会进行。数字化、可持续发展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联合项目在受访者看来充满前景，可以实现技术和社会优势的有效连接。

1 德国对中国的印象与 中国的自我认知



在猜疑与误解之间

中国受访者描绘了一幅德国和中国之间日益疏远的画面，认为德国媒体的歪曲报道为这种画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直接交流的减少，信任度也越来越低。

陌生的国度

许多受访者抱怨德国对中国的印象肤浅和过时。这种印象从“稻田里戴着草帽的农夫”一直延伸到专制极权的监控国家。中国的复杂性几乎没有被看到，人们既不了解中国不同区域的多样性，也不明白中国的发展动力。德国媒体经常热衷于众所周知的敏感话题：“人权、西藏、维吾尔族”。中国“幅员辽阔，丰富多彩”，简单的叙事模式必然会起到误导作用。受访者强调人员的交流接触可增进相互了解：“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可获得真实的画面”，经常听到受访者这样说，“中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唯有实地造访，方能更新认知。”

对媒体的批评

在采访过程中，许多受访者表达了对德国媒体的失望。德国媒体“只谈人权”，这是经常能听到的抱怨。受访者感到德国媒体往往抱有意识形态的偏见，认为德国媒体的报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批判性文章更符合编辑部的要求”。

“**当今的德国报道将中国描述为既强大又危险，在评价中国时将价值观放在第一位。**”

新冠疫情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随着新冠病毒的爆发，可以“明显感觉到与中国的疏远”。德国媒体对中国技术和安全措施的报道也被认为是扭曲的。有关“甚嚣尘上的社会信用体系的荒唐故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个不实故事指责中国通过完善的电子监控系统，拒绝向那些不遵守法规的公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这给人一种感觉，即某些关于中国的叙事方式已经固化了，根本不顾发生在当地的事实在当地的事真相。

接触而非对抗

一些受访者强烈要求不要只盯着中国政治制度。“我们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说，我们有日常忧愁、梦想和好的或坏的习惯。政治对抗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升级：“制度性对手”一词损害了双方的关系。受访者话语间显得失望：“过去德国人渴望探索中国”，现在则使人感到了“某种敌意”。受访者先后谈到了“抨击中国”，在德国受到“辱骂”的朋友，同时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尊重：“我们不谋求霸权，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外语短板

有几位受访者抱怨中国没有在国际上很好地介绍自己。沟通方法“笨拙”，“不易让人接受”。正如其中一位受访者所说：“能很好解释中国意图和想法的人英语不太好，英语说得好的人又无法很好地传达中国的思想。”尽管西方国家努力试图了解中国，但中国缺少合适的对外宣传的手段和模式。

“我们必须学会更好地与外界沟通。我们所说的话必须变得让人更易理解和接受。”

“美国人做得比较好。他们邀请年轻的外交官并向他们解释美国想要什么。”西方对中文的不了解也使相互理解变得困难，一个核心问题是“欧洲说中文的人太少了”。一位受访者认为，德国记者格德·鲁格（Gerd Ruge）对更好地了解中国这项挑战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在中国呆十天，你会写一本书。在中国生活十年，你连一张明信片都不敢写。”

向的。有影响力的中国声音吸纳了德国的批评，并进行了深思。然而，开放必须是双向的。因此他们呼吁：“两国人民应像朋友一样交往。”这不是为了否认差异，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彼此。

亲密不再，信任消失

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彼此充满好奇心，但现在往往只有怀疑。关于原因有很多猜测。许多人把这种变化归因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例如俄乌冲突、绿党的态度或地缘政治阵营的总体转变。受访者认为经济因素也对这种变化产生影响：“过去，中国不是竞争对手。现在不一样了。”受访者普遍认为，对中国的恐惧“毫无根据、幼稚且天真”。但这种恐惧影响深远，不仅阻碍了交流，而且还损害了信任。一位受访者一半讽刺一半无奈地说：“你必须有一颗良好的心脏才能阅读德国的报道。”

呼吁接触交流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希望德国人能增加对中国的直接体验，认为这是获得独立中国印象的必由之路。“来到中国的人通常带着更加正面的形象回去。”邀请很明确：“来吧，你们亲自来看看！”这种接触不应是单

中国的自我形象及其根源

在守成与应变之间：受访者勾勒出一个在全球动荡中回望根深蒂固的古老秩序，同时又在为满足现代要求而奋斗的中国形象。

平衡之道

许多人强调中国思想的特殊逻辑：不是对抗而是平衡的，不是直来直去而是迂回曲折的，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受访者通过隐喻和比较表达出一种画面：“欲上先下，欲右先左”，或者：“就像演奏音乐一样，你不能简单地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地弹奏，关键是音调之间的关系。”这些画面中蕴含着运动必须加以控制，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稳定的信念。

“中国的关系中隐含着独特的哲学智慧，有章法的‘动’才能保持稳定。”

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西方世界过于痴迷于速度、对抗和外部变化。受访者们强调内心的取向：“持中守衡，避免妄动。”这是一种不靠霸权图谋而靠和谐支撑的战略实用主义。

工作、日常生活和适应

许多受访者都谈到了中国社会极大的工作积极性和自律，旁敲侧击地挖苦了自以为更舒适的西方世界。有人调侃道：“在中国，我们一周工作 8 天，每天工作 48 小时。”还有人描绘说，当欧洲人下午坐在咖啡馆里

时，中国人还在卖力地工作。在这些话语背后，不仅仅透着一种自豪感，更蕴含着一种深刻的觉悟：在一个飞速发展、社会期望压力巨大且面临诸多问题的国家，拼搏奋斗是一种必然。然而，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挑战之间的张力也日益凸显，例如追求繁荣与“新儒家思想”的调和关系。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实则是一种“非情愿”的现代化。

根深蒂固的和谐理念

在采访过程中，受访者为中国描绘了一幅具有平和宁静和坚守初心特质的自画像。其中最为核心的一句话是：“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攻击另一个国家。”受访者用中国自己的历史来佐证这一说法：“中国在其历史上从未侵略过另一个国家。”

“我们的愿望无非就是想让家人有一个安宁、幸福的未来，没有任何人民想要战争。”

这种自我理解源自对外部影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例如，强调过去人们一直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且为蛮夷所环绕”。今天，人们变得开放，但仍然首先只关心自己的福祉。在谈到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时，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只要与我们不发生直接关联，“我们就无所谓”。稳定是理想，而不是逞强争霸。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也不谋求霸权，而是希望“在繁荣中的和平共处”。

传统与现代：跨越不易

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努力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同时保留自己的文化特征。中国古老的农耕制度被描述为许多思想和行为模式的起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个充满宁静、适度和周而复始韵律的平和世界，与“更具侵略性的游牧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受访者同时也强调，全球化、技术发展和新出现的社会要求使这种传统面临压力。这导致人们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们不想简单地采用西方观念，另一方面又不想显得落后。这就形成了一个依靠自己来应对外部挑战的社会形象，这种应对是摸索和探索性的，但显而易见始终扎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

对话中的人权

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述，折射出一种复杂的混合心态：其中既有不解与自我辩护，也不乏审慎的自我反思，更蕴含着根本性的概念差异。受访者的态度在自我坚守与理性开放之间摇摆——同时寄托着一种期待：希望对话能成为沟通的桥梁，而非攻击的武器。

一个概念，两种理解

许多受访者都表达了一个核心思想：人们对人权的理解不尽相同，往往会受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对人权的认知在中国和德国是不同的。”西方社会将公民的个人自由权放在首位，中国则强调社会稳定、发展和集体福祉。

**“中国确实有人权这样的东西，但是
一种中国式的人权。”**

有受访者简洁地表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欧洲的人权概念毫无意义”。这种差异不但会导致误解，而且还会引起对抗反应，尤其是当来自欧洲的批评被视为说教或作为工具使用时更是如此。所以，“绝不能用基于价值观的对华政策来展示自己的优越性。”

在辩护和自我批评之间

多位受访者指出了中国取得的进步，例如在教育领域或脱贫方面。“今天，童工、加班、义务教育等受到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受访者也不否认存在问题：“中国近年来在言论自由方面出现了倒退。”关于新疆

1 德国对中国的印象与中国的自我认知

的“再教育营”，偶尔也有人提及那里可能存在人权问题。一位受访者说：“是的，新疆有过西方所谓的‘再教育营’，那里肯定也有它的问题。”下意识的否定有时也会被深思所打断，例如有人在思考，中方是否“必须变得更加透明”。

新疆——叙事的雷区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问题像新疆局势那样具有争议。访谈中收集到的许多陈述似乎试图将政府的措施解释为对实际存在的问题的反应。极端主义、贫困和缺乏教育被认为是主要原因。“有些维吾尔族孩子不去上学，而是在家学习如何杀汉族人”，把培训体制视为保护措施的受访者辩护道，“难道我们应该容忍这种情况吗？”在他们的陈述中往往还隐含着对西方的指责，认为西方的批评无视当地局势的复杂性。

“新疆的问题相当复杂，尤其是极端主义。但我们可以慢慢解决这个问题。贫困也是那里的问题。”

个别受访者对培训中心的教育体制作出了比较积极的描述：“这些再培训的措施对一些人来说也很有价值。”以中国的标准来看，学生六人或八人同住一个房间并不罕见，与歧视维吾尔族甚至侵犯人权无关。

如履薄冰的人权对话

受访者对人权对话的作用评价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对话有必要，认为“保持人权对话是正确且有益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权

对话已陷入僵局或徒劳无益。“人权问题有点难，而且也是一个充斥媒体的话题。”不少受访者寄希望于其他领域的对话，例如法治对话或学术交流。有受访者建议说：“政客们为什么要谈论人权呢？政客们谈论人权就免不了要对别人说教。人权是一个法律和科学范畴的话题。”这表明了人们希望开展平等的对话，摒弃政治对抗、说教式的姿态和象征性道德。

在评判与现实之间

许多受访者对在他们看来被西方扭曲的中国形象表示愤怒。媒体报道是片面的、污名化的，而且往往具有误导性。“我认识《南德意志报》的菲利克斯·李（Felix Lee），他在写维吾尔族人的文章时，编辑部要求那里的天空必须是灰色的。”这种批评声音也指向西方的抗议，“西方抗议中国实行死刑，但不反对美国的死刑。”这是一种道德双标，它阻碍了参与对话的意愿。

“我的印象是，西方人只是想通过人权对话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受访者反复强调需要有更多的人员交往，认为只有这样西方才能获得更加多元的中国形象。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要想评判中国的人权，首先就应亲眼看看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了解他们面对的矛盾、挑战和发展。

政治中国

关于政治制度的陈述揭示了一种在自豪与怀疑、适应与控制之间徘徊的复杂自我认知。他们描绘了一个高度复杂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动态变化逻辑令西方观察者难以理解。

并不只是一个中心

针对西方观点最常见的反对声音之一是：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受访者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政治结构中的多样性和地方自治。“在德国，人们可能以为中国的一切都是自上而下发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地方利益、自主决策与某些甚至有违常规的灵活实践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尽管中国有严格的监管，但很多事情也都没有按计划发生。中国也不是千篇一律，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党也并非无所不能。”

一位受访者举例说明了上海的一些城区，乃至周边地区几乎荒废的村庄是如何通过“自下而上”倡议得到改造发展的。受访者一再指出，省政府和市政府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常常竭尽所能，有时甚至采取中央政策允许以外的引资措施。中国有句俗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说法淡化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形象，强调了地方发展动力的作用。

党了解社会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没有可比性，它更像是一个从社会吸取养料同时又塑造社会

的“全社会组织”。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双重动能才是它的真实特质。一个核心观点是：“如果你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你就无法理解中国。”中国共产党被描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结构，曾经是列宁主义者，现在部分是儒家思想者，越来越保守。对一些人来说，中国共产党是秩序的保障，对另一些人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开放的障碍，但无论如何它很难被替代。“中国共产党绝不能被妖魔化”，因为它虽然走过弯路，但它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整个中国社会，它了解社会并将其经验系统化。”

一位受访者感慨道，“以前我有时也觉得党是发展的障碍，觉得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很有吸引力。但今天我觉得我们的制度并没有那么糟糕，用另一个制度来取代共产党并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变化。”企业、高校等机构的党干部也值得尊重。与以前不同，现在这些干部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会只是僵硬地执行党的路线，而是为本单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这种矛盾心理贯穿于许多受访者的陈述。

字里行间的自由

受访者对自由表达的空间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谈到，社交媒体使舆论变得更加开放，微博中出现了批评普京的声音。另一些人则谈到了自我审查、“数字警察”或艺术禁忌。“你在这里不能畅所欲言，必须十分小心你在说什么。”这句话就是这种紧张气氛的一个示例。

“当然还有动员和指导群众认清和消除危险因素这样的治国方略。”

但这种限制也孕育了新的创作策略。“如果你被允许公开表达一切，创作艺术就会变得枯燥无味。”这类表述指代一种诗意图性颠覆、间接路径和形象化映射，这是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文化，它并非没有风险，是韧性的一种表达。

以审视的眼光看待变革

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是监管和变化并存。许多人强调政府的专业素养：部长们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核审查，具有在下一级单位工作的经验，专业能力至关重要。在这种精英主义逻辑里隐藏着一种不同于西方裙带关系或对政党盲目忠诚的自信。与此同时，透明度和监管、公众信任和政治压力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例如，有受访者讲述了一个通过监控摄像头重新找回丢失的“爱猫”的故事，这是这个监控系统日常使用的一个场景，但这个系统同时也可产生令人生畏的作用。

开放的局限性

外国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学术界的准入变得更加困难。许多人抱怨新的许可要求、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以及日益增加的不信任言论。“过去，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是很正常的”，一位受访者回忆道，“但今天，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受访者同时也表示，中国必须保护自己的信息主权，例如通过既可进行内容审查又可实行

经济保护措施的防火墙。反复出现的观点是中国不想固步自封，但也不会屈从。开放看上去仍然是可选择和可逆的。

免谈政治——果真如此吗？

许多受访者谈到了在政治上的分裂态度。对国家来说政治十分重要，但对个人往往就无关紧要了。这与德国“人人皆政治”的情形完全不同。另一方面，中国人也经常谈论政治，但只是在熟悉的圈子里，而不是在公开场合。

“你不能自由地说话，必须非常小心你说的话。过去有四个‘T’，即天安门、台湾、西藏、突厥斯坦（新疆）。最近，又增加了个‘X’。”

但日常生活往往无法完全脱离政治，比如在与官员的互动中，在公共讨论中，在社交媒体上。一位受访者表达了在中国经常出现的内心冲突：“我敢说，我比一般的警察更爱我的国家，虽然他乍一看更听话，而我有时会表现出不满。”这表明，民族忠诚和批判态度不一定互相矛盾。中国社会不是不思政治，它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政治。

在矛盾中成长

中国受访者描绘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形象，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保持警觉，也明显显露出被自己的发展速度所累。他们的语气在自信和思虑之间，在经济雄心和渴望内心平衡之间徘徊。

快速崛起，分配不均

许多受访者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感到自豪，但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内部失衡的问题。有受访者说：“中国用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欧洲一百年的发展之路。”但代价也很昂贵。“我们的发展速度很快，但也很肤浅。”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与其它地区的差异非常巨大。下面这句话让人感觉到了中国之大：“中国的残疾人数就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这样的比较凸显了在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还要全面确保生活质量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危机遇上雄心

经济放缓正在多地造成不确定性。“经济形势很糟糕”，有人尖锐地总结道。受访者指出了新冠疫情、数字化发展和当前地缘政治冲突给人们带来的情绪变化。内需下降、消费疲软和出口限制正在引起人们的担忧。与此同时，进一步发展的意愿没有消失：“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技术更新。”教育、精益求精、认真严谨等典型德国美德在一些受访者的陈述中被视作所追求的发展目标。一位受访者言简意赅地指出：“物质的东西容易超越，但要在教育和经验方面超越就不那么容易了。”

变革带来的疲惫感

尽管在物质上取得了进步，但伴随而来的是深感力不从心。“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之后，许多人都感到疲倦”，有受访者说，“社会变得筋疲力尽，人们变得焦躁不安，即使在欣欣向荣的城市也有许多人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严重担忧。我们内部有很多问题，人们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对未来感到恐惧。”

一位受访者说：“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远离政治，他们忙于自己的日常生计，这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这种飞速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上，而且也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印记。”

渴望被看到

受访者一方面谈到了中国的不足之处，一方面希望中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许多受访者呼吁外界更多地了解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批评中国之前，应该首先想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受访者认为，有些对中国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有些批评往往是不公平或片面的。“西方的大多数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根据的，但我认为，应该在正视中国努力改善现状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中国并不完美，但它正在努力。况且中国将势不可挡地成为世界第一的说法在中国国内也饱受质疑。一位受访者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的说法。”

中国路径

受访者多次提到中国追求符合自己国情发展的模式。欧洲是中国发展的灵感源泉，但不是蓝图。“中国正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仅把国外的元素作为工具来使用。”

“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借助外来的帮助实现现代化，但简单照搬别人的经验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走自己的路。”

这种务实的学习与传教士式的说教形成鲜明对比。愿望很明确：赢得空间和时间，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无需外界指手画脚，但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全球责任。或者就像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那样：“给中国空间和时间，让它走自己的路，世界也需要正当合理的替代方案。”

2 德国形象光辉不再



从好奇到醒悟

德国在受访者心目中的形象既令人钦佩又使人困惑。德国是一个有诸多优势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一直受到重视，但却变得越来越疏远。

“德国制造”的可靠性

许多受访者将德国与“严谨”、“规范”和“质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一位受访者说：“我的印象是，德国人的工作方式非常严谨，一切都非常有条不紊。”工程技术和“德国制造”仍被认为是强大的品牌，就连日常生活中的纪律性也被称道：“德国人即使在凌晨三点没有车经过的情况下也会停下来等红灯！”然而，这种对遵守规则的执着虽然令人钦佩，但也令人感到奇怪。一位受访者带着些许讽刺称其为“规则恋”。

人情冷漠

受访者认为大部分德国机构形象良好，但德国人在不少受访者眼里却有点冷漠。“与德国人交朋友很难”，一位受访者这样说。对德国人的描述从“矜持”到“冷漠”，有时还夹杂着消极情绪。一位受访者说：“如果你不会说德语，几乎不可能融入德国社会。”受访者还谈到了文化误解，例如德国人偏好直接批评，但许多中国人会因此而感到被伤害。

“在我们看来，德国人的沟通非常直接，这在中国完全不同。”

许多受访者希望德国人能更热情开放。

自以为是，喜欢说教

一个集中的指责是德国人说话时所显示出来的带有道德优越感的语气，一些受访者认为德国人盛气凌人。德国显得“说教”、“傲慢”，甚至是“传教士式的”，“德国人常常以为他们更了解一切”，在有关人权或政治制度的辩论中尤为如此。德国所做的努力本身并不负面，但音调决定了音乐优美与否。在许多受访者的感知中，德国人对中国语境缺乏好奇心。

政治上的双重标准

许多受访者对在他们看来前后矛盾的德国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评。在做法相似的情况下，中国会受到严厉批评，而美国等西方伙伴则不会受到批评。一位受访者尖锐地指出：“德国人看得见别人眼中有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梁木。”

“德国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已严重受损。这主要归咎于加沙问题，德国政府的政策采用了双重标准。”

在许多人看来，德国的政治沟通也显得自相矛盾——例如，当经济利益与价值观导向的言论混杂在一起时。这不仅使人沮丧，还会导致信任的逐渐丧失。

尊重——但渐行渐远

尽管持批评态度，但德国在许多人看来依然一个重要和值得认真对待的国家。“德国就像一位年长的表兄，有时会很烦人，但你仍然会听他述说”，一位受访者俏皮地说。

这些陈述反映了不同的观点：德国是一个有实力的重要国家，但它容易自我陶醉。对德国的尊重并没有消失，但它已经融入于日益独立的中国自我形象中。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我们可以向德国学习，但我们不再愿意让德国来评判我们。”

德国变成了什么？

在怀旧与担忧、认可与不安之间，中国受访者勾勒出一幅处在变化中的德国形象——困惑、矛盾，而且常常令人失望。

渐渐淡去的安全记忆

许多受访者回顾过去，怀念那个曾经被认为是安全、友好和有序的德国。有受访者回忆说，“那时我在德国感到很安全，即使作为女性，即使是在晚上，但这已成为过去。”犯罪率上升、入室盗窃、偷窃以及被骚扰的个人经历是被特别提到的变化感受。

“**德国的局势已经恶化。德国过去更安全、更干净。今天，你经常听到偷盗和袭击的消息。**”

这些看法往往会造成一种总体失序的感觉，使人感到“德国已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受访者还对在德国的亲属表达了担忧。一些观察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我担心我在科隆的女儿。”德国铁路和街道上的气氛折射出德国公共秩序的衰败，与“干净、友好、整洁、有教养、有礼貌”的怀旧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一样的街景

许多中国受访者对德国城市面貌的变化表示不解，“外籍劳工、移民比例非常高”，“大街上到处都能碰到外籍劳工”，这些场景在他们的德国感知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惜德国不再像过去那样美好了。一切都变得更加昂贵，街景也少了德国风貌。对于那些非常喜欢昔日德国生活的人来说这一切太遗憾了。”

内部变化

许多受访者也关心德国更深层次的文化和政治演变。对缺乏言论自由的指责，甚至成为一本书的书名：《只有正确的意见才是自由的》，这显示出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批评指出，德国曾经的对话文化已被政治正确和精英思维所取代。由于强调性别平等，德语现在变得更加复杂了——这是一个微小但具有象征性的迹象，表明实用主义和贴近日常生活的精神已经丧失。

受访者也谈到了经济政策问题：“德国通过全球化赚到的钱去哪儿了？为什么到处都缺钱？”虽然没有答案，但这些问题本身就表明对一个正常运作系统的信任已出现了裂痕。

在停滞与希望之间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和担忧，一些受访者对德国仍然抱有希望。大多数人认为，德国会“再次证明自己”——尤其是年轻一代。人们希望德国能重振经济、减少监管、对创新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正是通过社会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内部的彻底革新。”

受访者在批评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对德国的尊重。“希望德国继续繁荣昌盛”，有受访者表示，“我相信德国和中国都有美好的未来。”这样的声音比以前少了，但依然能听到。这种声音显示出对未来前景的矛盾心理：疏离与联结、失望与尊重、昔日形象与当今现实。

德国的优势

工艺精良、历史责任感和全球榜样共同构成了德国的形象，这一形象令人尊重、钦佩，同时也包含充满批判性的好奇心。

精准、工艺、系统性思维

“精准”一词被经常提到，不是出于客套，而是许多人的亲身经历。无论是手工工艺（例如小提琴上的螺丝）还是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技术，德国都被认为是一个追求精准的国家。受访者强调了德国中小企业的实力以及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创新实力，对许多人来说，它们“总是能推出颠覆性的东西”。

“我们愿意向德国的‘隐形冠军’学习，大家都十分关注它们。”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同样被认为具有结构优势和榜样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的职教体系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经常有人认为，德国的优势不仅在于个人创新，还在于系统、耐心和卓越方法论的相互作用。

反思历史，提升自我

德国对自身历史问题的态度备受赞赏，被认为是世界的“典范”。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公开讨论经常被用来与日本的态度作比较，因此，德国被视为是一个正直的国家。

“德国善于反思自己痛苦的经历，非常积极地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的全球秩序。”

一位受访者的话来说：“德国在历史问题上处理得非常好，并且明确致力于和平与更加公平的世界。”受访者们表示，德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使德国在国际组织中扮演着特别的角色，并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技术能力

虽然德国被公认为“制造业的技术中心”，尤其是在机械制造、化工或机器人等领域，但这种赞美声中也夹杂着些许怀疑。“德国今天在哪些创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它暗示着对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性。一些受访者认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可能会波及“优秀人才”。德国在内燃机创新上的领先优势被理解为一种“路径依赖”，它虽然仍然在发挥作用，但德国必须在电动汽车领域以及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等新领域取得更快的进展。

社会平衡作为区位优势

除了技术以外，日常文化和社会平衡也获得人们的认可。加班少、社会差距小乃至狂欢节都使德国在受访者心里留下了一个组织完善和人性化的国家形象。数据保护、女性在职场的安全感或网络暴力应对机制也被认为是德国“遥遥领先”的领域。

德国的弱势

本调研的许多参与者描绘了一幅德国已经跟不上当今发展形势的图景。受访者普遍认为，德国结构性惰性严重，官僚体制僵化，经常坐失良机。

一个频繁刹车的国家

受访者将德国描述为一个原地踏步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则在不断超越。

“**德国已近乎僵化。德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创新力了，经济也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人们认为德国过度注重规则，“德国太墨守成规了”。如今，这些规则无法确保稳定，反而阻碍了发展。德国被认为“保守”、“太慢”和“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主和强大”。受访者特别提到了德国在技术方面的落后：对现金的依赖、数字化程度不足、互联网基础设施薄弱。有受访者说，“德国活在过去的成就里。”许多人提到德国就会联想到一个不再超越自我的社会形象。

请等待！

一个反复出现的抱怨是，曾经令人钦佩的德国官僚机构现在已成为一种障碍。例如，签证程序被描述为带有羞辱性且令人费解。有受访者带着一丝苦涩说道：“我们不是难民，而是认真做生意的商人。”一些商务旅行者“苦等文件长达 14 个月”，经历了管控、猜忌与过度监管交织而成的恶性循环。相比而言，“同样是申根签证，在法国大使馆申

请只要 3 天就办妥了”，差距非常明显。德国的铁路出行或医疗服务等日常事物也受到批评，有人讲述了“等火车等了 70 分钟”的遭遇或在德国领事馆所经历的“一场灾难”。

不进反退

在许多受访者看来，停滞也出现在社会领域：“在德国，社会升迁的机会很少，每个人都停留在自己的阶层里。”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德国似乎不再开放、宽容和创新了”，这个国家给人的印象是“主要活在过去的成就中”。

“**德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已经停滞不前，呈现出一定的饱和状态。**”

一些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心理问题——德国是一个“趋于极端”并纠结于自己历史的国家。早年的德国城际快速列车 (ICE) 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它曾是进步和速度的象征，但今天几乎很少准时了。

加油，德国

尽管有各种批评，但许多受访者也祝愿德国能重塑自我。人们希望看到一个“不那么死板”的德国，希望德国能“向法国人学习”，不要把历史“视为负担”，而应把它看作激励自己飞跃的“翅膀”。在失望和希望之间，德国给受访者留下了一个有瑕疵的国家形象，但只要敢于改变，它仍大有作为。

德国政治何去何从？

中国受访者对德国政治的陈述呈现出一幅不确定的画面：钦佩与嘲讽交织，认同与茫然并存。但共同的是，他们都希望德国的政治能更加清晰务实，少一些意识形态。

偏离正道

受访者表示德国经常有一些令人费解的政治路线。淘汰核电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仅因为它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被认为 是不明智的，还因为德国从法国进口核电，这被认为与弃核的本意自相矛盾。“我们真的不理解德国的这些自杀式策略”，有受访者尖锐地指出。这句话同样也针对德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

“德国切断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中断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安全政策上也与美国渐行渐远。”

这些不理解并不只是一种愤怒，同时也表达出对可预测性的迫切需要。“德国没有明确表达其利益所在”，“太受制于美国和绿党”。有人提到了俾斯麦和默克尔，希望德国能保持战略连续性。

意识形态太多，实用主义太少

许多人对德国“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政策感到不安，认为德国缺乏清醒的现实主义，指责德国“不以目标为导向”，太“自顾自了”，有时行为“愚蠢”。在中国被嘲笑的德国“供暖法案”被认为是草率和不切实际的立法象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 的做法是

先开展试点项目，然后推广实施并不断调整。这种比对并不是要标榜自己，而是强调制度的差异。

绿党——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几乎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像绿党那样受到如此尖锐的批评。绿党被认为夸大意识形态、排斥技术、有损经济，对在中国人看来削弱德国实力的政策负有主要责任。除了前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主导推出的供暖法以外，前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在国际场合的表现也被频繁提及。受访者用下面这些严厉苛责的词语来描述贝尔伯克：“丢人现眼”、“傲慢”、“不懂外交”、“像一个没有教养的人”。这些评价也许是主观的，但它们表明，即使跨越文化距离，一个人的言辞和举止也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德国的外交损失被低估了——“贝尔伯克女士的表现无疑使德国在中国的销售额减少了数十亿美元。”

碎片化、两极化、迷失方向？

在受访者看来，德国的政治格局支离破碎且不稳定。针对选择党的“防火墙”一方面受到尊重，但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适得其反——它只会让该党变得更强大。与此同时，像爱丽丝·魏德尔这样的政治家却出人意料地受到好评。她与中国的联系以及接地气的作风使她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物。

“德国必须要注意，普通百姓的处境不能比难民更糟糕。”

魏德尔的政治背景和选择党的右翼极端主义在中国几乎不被注意到，这也表明中国对德国国内政治认知中更深层次的不对称性。总的来说，德国给受访者留下的印象是迷失了政治方向。一位受访者这样呼吁道：“德国必须再次明确自己的目标方向。”这也意味着：如果你想领导别人，你必须知道该去哪里。

德国陷入领导危机？

愿望、期望和醒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形象存在矛盾：潜力巨大，但缺乏果断的执行力。

回避领导角色

在许多人眼中，德国依然是欧洲的“头号强国”——这一判断几乎像一种外交上的本能反应，但其背后却暗藏着深深的疑虑。人们对德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经济实力及其作为欧洲引擎的作用依然表示钦佩，但大多数受访者对德国当前的领导行为表示失望。以前是“德国即欧洲，欧洲即德国”，一个受访者说，但今天这个国家看起来就像“腿上戴着枷锁”。很多人都提到德国回避担任明确的领导角色，这一点令人颇为失望：“德国有自己的主张，但没有那么明确地表达出来。”受访者多次强调，希望德国不但要出来主持局势，而且应该发挥领导作用。但许多受访者怀疑德国是否有这种意愿。

默茨——德国改革的风向标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这个名字经常被提及——不仅仅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作为一个被寄予改革期待的标志性人物。人们在对他寄予厚望的同时，也传递着某种压力：他应该“带领德国走上增长之路”，“让欧洲更加自主”，并表现出“新型的领导责任”。一位受访者表示希望默茨能够成为一位“历史性的德国人物”。

“我希望默茨能够发挥领导力，让德国重回增长轨道，并使欧盟在重大全球问题上与我们合作。”

与此同时，话语间也带着一定的谨慎，因为人们“感觉得到”默茨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他关于“再武装”和加沙冲突的言论引人瞩目——不一定得到赞同，但被视为是其领导意图的显露。有关该由谁来主导欧洲的争辩给人们带来了某种困惑：如果不是默茨，那还有谁？

可以主导，但不可主宰

受访者区分领导和霸权。他们多次强调，德国“不应该充当欧洲的霸主”，而应该成为“正面的榜样”。这是责任感，而不是统治权。德国被视为“中国和欧盟之间的重要联络伙伴”——在全球秩序、乌克兰安全保障或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是如此。这种角色认可证明了受访者对德国处理各种多边外交事务能力的信任。当然这种信任是有条件的：勇气、清晰和独立思考——特别是与美国政治划清界限。

向柏林发出的邀请

在讨论德国领导角色的同时，受访者也审视了欧洲的整体形势。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英国已经不是欧盟的领导者了。法国虽然被描述为政治上野心勃勃，但受访者话语间带有些许怀疑：“法国人想这样做，但他们无能为力。”这形成了德国实际上可以填补的权力真空——如果它愿意的话。但出于对彼此的尊重，法国和德国似乎都没有迈出果断的一步。经常被提到的魏玛三角（德国、法

国和波兰）也没有发挥“自己的动力”，欧洲似乎已经“解体成几个分散的小型网络”。这一评价所体现的并非消极无奈，而是敏锐的洞察力——它更隐含着对德国的呼吁，期待其能挺身而出，阻止当前的碎片化进程。

中国的希望

尽管存在种种批评和质疑，但我们依然能明显感到受访者与德国的情感联结。一位受访者说“虽然我最近几乎没有时间去德国，但我心里仍然希望这个国家能够保持领导者地位。”这反映出一种更深层次的、近乎朋友般的关系——虽然有些失落，但不会厌弃。

“德国在欧盟发挥着主导作用，是中欧之间的重要联络伙伴。”

受访者并不认为欧洲是德国的负担，而是其发挥的舞台。受访者明确提出：“德国应该再次在欧洲发挥更强大的领导作用。”人们希望德国不仅能成为全球发展的协调者，更能成为全球发展的塑造者——拥有自己的声音、坚定的立场和清晰的方向。

3 德中关系



从亲近到相背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德中关系显得矛盾：经济上亲密，政治上冷淡，人文交流上捉摸不定。许多受访者希望中国能在平等的对话中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可，但现实中中国却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拒绝、误解和疏远。

好口碑摇摇欲坠

作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技术和工业的榜样、严谨与秩序的捍卫者，德国在中国总体上享有良好的声誉。许多人明确表示赞赏：“德国一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但语气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越来越多的受访者提到，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人文层面上，双边关系都有明显降温。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威胁，这使人们深感失望：“当德国在经济上优于中国时，我们没感到敌意，我们想学习。但当情况反过来时就不一样了。”这句话的背后隐隐带着一丝对信任关系瓦解消失的痛惜。

经济亲密，政治疏远

许多受访者认为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交织，经济是德中关系的基础。西门子和巴斯夫这些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开展长期合作并通过供应链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司为双边关系留下了烙印。与此同时，中国受访者也描述了两国在政治层面的渐行渐远，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政治上过冷，经济上过热”。

“红绿灯”联盟的政策，尤其是贝尔伯克外长的表现被认为是不专业、意识形态化和具有伤害性的。

“中国从未伤害过德国，为什么他们却要这样做？这是出于嫉妒吗？”

在许多人看来，新出台的中国战略彻底背离了已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

不安、理解和失望

受访者一再谈到双方的“情绪反应”——一种参杂着失望、伤害感以及不屈不饶的复杂情绪。他们努力在不放弃自己立场的情况下建立理解。“学生突然超过了老师”的比喻贯穿了多个陈述，这表达了一种集体感受：德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并且作出了防御性的反应，而不是认可。受访者警惕地指出，这种情绪失衡是危险的，有可能危及双方的正当合作。

亲近消失，交流减少

受访者批评最多的是人员交流的大幅减少。许多受访者回忆起以前的时光，那时候代表团定期出访，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友谊，保持着个人联系。例如，默克尔总理当年来华访问时，每次都会去北京之外的中国城市，但今天的高层访问显得仓促忙乱，浅显且充满不信任。“政府官员只停留 24 小时，没有过夜，只能简单地交换一下信息。”其他德国机构也在退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削减了资金，代表团未能出行，学术交流步履蹒跚。这些情况大部分是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但疫情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有的亲密程度。

谁是谁的朋友？

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对真正的友谊的探讨。许多人说，中国希望继续成为德国的

3 德中关系

朋友，但他们觉得这种友谊现在不再建立在双向互动的基础上了。有些人甚至看到了德国将中国视为“敌对国”的迹象。这不仅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人的心理情绪。

“给人的印象是德国不再把我们当朋友了——这损害了两国间的关系。”

这句话背后隐约显露出一些脆弱感，人们呼吁关注人性：“人与人之间的相似之处远多于差异。”

希望与沮丧

尽管有种种批评，但希望之光一直在闪耀——人们期待正常化交往、相互认可和务实合作。

“德国人应该放轻松点。中国有句成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请多一点耐心。”

一些受访者谈到双方必须建立一种“平等的新关系”，但这一点在德国还没有得到普遍认知。还有人认为当下的冷淡是一个转折点：“现在邀请德国人来中国，恐怕没人会来。”面对这一切，一位受访者表达了一个简单的愿望：“我非常希望德国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毕竟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德国有关。”

时代变迁中的德国角色

德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从早期的仰慕推崇，历经经济上的互利共生，发展到今天日益增长的疑虑。受访者的陈述在带着怀旧情绪的肯定和务实的现实主义之间飘忽变换。

曾经是师父，今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技术超群、严谨、诚实、道德榜样，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政治冲突。许多受访者都怀着敬意回顾过去：“那时候我们只有乡间小路，今天，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网络。”高速列车、流水线、俾斯麦的社会保障制度——许多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都源自德国。这种记忆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而且也充满个人情感：“我们必须非常非常感谢德国。”但德国这位曾经的师父并没有成为一个持久的榜样。中国向全球大国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力量对比——许多人认为，原有的捐助者和受助者关系已不复存在。

经济上亲密，情感上疏远

德国在经济上始终是一个稳定的参照基准。受访者称德国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并强调了德国公司的作用，认为它们比美国公司“更友好，更加注重互惠互利”。但受访者的语气有时并不温和，“德国曾经是对中国最重要的国家，今天它衰落了！”用词虽然严厉，但却显示出受访者对所感觉到的停滞的深度失望。有的受访者批评德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贻误战机”。现在发展势头已转移到其他地方：“与德国相比，中国的各

种应用程序发展得非常快。”德国给人的印象是，它在经济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已不再鼓舞人心。

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声音苍白无力

许多受访者几乎看不到德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无论是在俄乌冲突中还是在中东冲突中，德国的政治话语权“不再那么重要”。

“大约三年来，我们听到的德国声音越来越少。”这种缺位并不是因为遭到拒绝，所以令人困惑惊讶——尤其是当美国或印度等其他大国更多地活跃在媒体上时。欧洲偶尔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带着些许希望：“欧盟在政治上看上去越来越强大。”但德国却在失去自己的身影，就像一个撤离舞台的演员——谦逊矜持，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贯性

尽管如此，德中合作仍有着深厚而活跃的脉络——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学术、社会与文化交流的肌理之中。1907年由德国政府和德国医生在上海创立的同济大学、双元制教育、根据鲁尔区模式进行的城市转型——所有这些都是远超技术转让的合作例证。一位受访者甚至希望德国未来的活动能够“惠及更多的妇女、少数民族裔和儿童”——这是对德国经济之外的软实力的褒奖。德国的这种魅力是否还能延续到未来？或者它只会逐渐进入人们的记忆档案？这个问题目前尚无答案。毕竟，曾经在中国发展叙事中无处不在的德国形象已逐渐褪色，剩下的是一种夹杂着认可、疏离和希望重新修好的复杂情绪。

与中国的竞争

中国对德中竞争的立场在自豪、防御和竭力争取平等地位之间变化。

竞争是常态

许多中国受访者认为德中之间的竞争在经济上无可厚非，这是预料之中的现实。中国在电信和电动汽车等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事实被解释为辛勤工作、高速发展和极致的顾客至上精神所取得的结果。例如有受访者表示：“在中国，电池的开发周期一般在二到三个月。”这在欧洲几乎是无法企及的速度。

“如果在竞争中无法取胜，便会搬出意识形态，转而诋毁竞争对手。”

德国落后的事实不是抱怨的理由，这是全球博弈的一部分。

政府补贴——自信辩护与批判性反思

政府补贴的作用贯穿了许多陈述——其中部分是一种防御策略，部分是一种自我定位。补贴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而是全球通用的工具，形式各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规模和形式”。中国仍处于发展中，与德国曾经历过的情况类似。尽管如此，自我批评也不时穿插其间：产品供过于求，“效率低下”，而鉴于内需疲软，大规模补贴的做法能否长期持续也值得怀疑。一些受访者自信地呼吁通过世贸组织来进行国际监管，而不是费力地进行双边谈判——这就是世贸组织的职责所在。

知识产权——理想与现实

知识产权话题很敏感。受访者并不否认中国曾经是“抄袭大国”——相反，“我们擅长抄袭是事实——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

“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在中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只要是在监管范围内，模仿被认为是一种学习策略，而不是道德不端的行为。西方被指控滥用知识产权法来封锁创新，尤其是在药品研发方面，这甚至对全球社会构成威胁。而且，印度也在抄袭，但没有人谈论它。

中国经济模式的未来安全性并非毋庸置疑。因此，受访者的语气经常在进攻和防守以及“我们更快”和“我们必须变得更聪明”之间切换。与德国的竞争不是一件小事，它反映出中国为在全球变革中站稳脚跟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竞争被用作政治叙事

一些受访者批评说，德国关于公平竞争的讨论过于政治化。中国的人权和数据保护被拿来当幌子，用以实现德国自身的经济目标。德国对中国公司的担忧在他们看来是不合理的，怎么就不担心“可口可乐、星巴克、微软呢”？一些受访者认为，这种政治化的竞争叙事也会削弱今后的合作。“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大家应该本着互惠互利的精神来发挥这种潜力。”

对未来的忧虑

除了理性的论证和防御性的说辞以外，许多陈述中也流露出一些感性成分。对效率和科技影响力的自豪感中也夹杂着些许忧虑。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消费低，内需不足。”

德国的竞争力：颓势和潜力

对于德国的竞争力，中国受访者一方面表示高度尊重德国在工业方面的实力，另一方面对德国在未来科技领域的表现愈发感到怀疑。在认可和告诫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点：那些跟不上变化的人将面临被抛在身后的危险。

某些曾经的优势依然还在

尽管有各种批评，但很多陈述都是以赞赏的口吻开始的：德国“在汽车行业和精密制造方面仍然表现出色”，它拥有“金属加工方面最丰富的专业知识”，并拥有“非常好的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虽然中国目前几乎在所有与增长相关的领域都掌握了基础技术，但在许多领域仍然缺乏德国所拥有的高新科技。许多受访者认为，德国在医疗技术、生命科学、造船和化工等领域依然领先全球。作为难以复制的德国工程文化的标志，“认真负责”、“严谨细致”和“踏实可靠”等概念被反复提及。尤其在“智能制造”领域，有些人看到一种差异化特征：“在德国，它是有机运作的。”但这句看似简单的话里其实就蕴含着某种告诫：如果缺乏新的活力，即使是最好的技术最终也会被超越。

数字赤字，价格虚高

德国的数字化进程受到最尖锐的批评。德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效率远低于中国或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错失发展良机”，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事方式“早已过时”。价格和性能之间的差异成为关键问题。

“质量差异已经不大了，所以报出明显高于别人的价格是不合理的。”

糟糕的服务也导致明显的不满，例如“技术人员在休假、已经下班了或者今天是节假日等”。一些受访者认为德国对所谓细枝末节的关注度之高令人费解，而在关键技术的发展上却逐渐失去动力。“当全世界都在投资人工智能时，德国却在研究如何将瓶盖留在瓶子上的问题。”

革新的必要性

许多受访者抱怨德国改革的严重积压，缺乏“创新友好型文化”和承担风险的意愿，缺少风险投资，实施速度缓慢。一位受访者这样说道：“我不认为德国的战略是错误的，但实施速度实在太慢了。”其他人则更进一步提出结构性问题，认为“德国的体制已不适合这种新形势了。”

“我们非常尊重德国的技术，它的质量最好，但德国人缺乏灵活性和速度，特别是缺乏客户至上的服务态度。”

曾经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今天似乎已失效了。“德国一直坚守自己的商业模式，但这已不再适合当今市场的需求了。”而“升级换代”又姗姗来迟——不光只是在技术上，而且在人的思想精神上也是如此。

中国的崛起作为一种挑战

中国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几乎是所有陈述都绕不开的背景。无论是电动汽车、电池技术、机器人还是电信——中国的成功都在

挑战德国的自我形象。“如果产品质量几乎一样好甚至更好，但价格便宜得多，德国会怎么办呢？”以前德国品牌被看作是身份的象征，但现在它们的知名度正在下降。一位受访者说：“德国曾经是机械工程的大师。今天，人们在创新时想到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而德国在这方面并不领先。”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怀有希望：“德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德国。”一些人认为，双方联手将会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昔日声誉和新型要求

“德国制造”在中国依然有着“极好的口碑”。但由于质量下降、第三国生产和结构性惰性，曾经的好声誉开始蒙上阴影。德国的自我形象也受到质疑：“德国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示人了。”受访者的语气从满怀敬意，到语带讥讽，最终显得无奈。下面的陈述使这种变化变得具象：“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德国汽车被认为是身份的象征，但今天已经不再是这样了。”一些受访者仍抱有希望，认为德国的质量、制造工艺和进取心等原则将重放异彩。但一些受访者认为德国已经落后，他们呼吁德国“必须做好自己的功课”。

去风险与平衡艺术

在安全关切和合作愿望之间：中国的视角包含着困惑不解、战略警惕和呼吁保持务实三重态度。

经济逻辑与安全思维

许多受访者认为，政治安全担忧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虽然政客们越来越多地根据“军事逻辑”来识别风险，但中国受访者认为，企业完全有能力自己对风险做出专业评估：“他们值得信赖，因为他们的风险评估也非常专业。”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重警告：如果你“拿着风险眼镜来检查一切，那么每个产品中都有危险”。受访者还指出一个实际问题：中国以外的供应链效率较低，质量也无法与之媲美，这危及到德国子公司的竞争力。一个受访者认为，去风险“对德国子公司的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有些企业甚至考虑是否以及如何脱离母公司并独立开展业务。

制度性对手还是战略朋友？

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术语像“制度性对手”那样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它显得“非常不友好”，听起来“像敌人”，并且“有害我们的关系”。相反，许多受访者呼吁“将伙伴关系放在首位”。制度性对抗使许多人想到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并怀疑中国被指责想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

“我不明白什么是‘制度性对手’，我们又不是想让德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中国根本无意去改变德国的制度，“我们压根就不想操心德国的事”。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已告诉中国，意识形态冲突的破坏性有多大。因此，中国倡导理解“制度差异”，主张坦然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

不恰当的简单化

从一些陈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对德国辩论文化的尖锐批评。这种辩论文化“突然变得极其简单化——不仅民间如此，就连科学界也不例外。”“价值观伙伴”一词含义模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意味着，如果你没有相同的价值观，就不能成为合作伙伴？”另一个指责是“没有最优秀的汉学家参与中国战略的制定”，“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根本没有参与其中。”在受访者看来，这一战略主要是“做给美国人看的”。人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务实精神”——就像科尔或默克尔时代那样。有时也可听到自我批评的声音：“中国也保护自己的产业”，有些交流也受到中方的限制，例如在教育领域或技术转让方面。

风险、对抗、现实

受访者对欧洲战略的政治潜台词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德国把中国列为“制度性对手”，这不仅有问题，而且在战略上也不明智：“我理解德国所说的战略对抗是什么意思，但把这种说法公开讲出来，实在是不太明智。”

“不能因噎废食。”

受访者希望不要搞单方面脱钩，而应倾力打造“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

建立起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无处不在的焦虑和恐惧，只会使人陷入一种“自证预言的怪圈”。

过度反应和不确定性

除了针对政治战略本身，受访者对其执行情况也颇为质疑。去风险“从敏感领域”扩展到科学、教育和技术转让，这一点尤其引人担忧。这种溢出效应危及长期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如今，交流项目越来越少，即使在象征性层面也出现倒退。“现在就连德国大学生都害怕中国，真是太可惜了。”投资也因此受到影响。库卡收购案以及关于华为的争论被视为转折点。当前的形势充斥着不确定性，没人知道什么是仍然被允许、被容忍甚至是受期待的。

对未来的希望

尽管有这么多的批评，但受访者陈述的基调仍然出人意料地具有建设性。中国想要“和平、全球化和繁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德国是出于对美国的顾虑才采取这一行动。人们希望欧洲能有更多的独立性。“德国不应该让自己如此依赖美国。”人们对正常化的渴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但不是制度性对手。”面对不断重复的标签化和战略归类，受访者的语气中慢慢透露出一种疲倦感。

“所有国家都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4 动荡中的全球秩序



全球失衡

在震荡和塑造意愿之间——中国受访者勾勒出一个动荡的全球秩序，其特点是深度不信任、结构失衡，但也包括对和平共处的强烈呼吁。

倡导多极世界，摒弃权力博弈

许多受访者描述了多极世界秩序的理想，认为当今的全球权力分配与这种理想背道而驰。对许多人来说，美国、中国、欧洲的“战略三角”比不稳定的两极世界更有吸引力。动机很明确：通过平衡实现稳定。中国并不将自己视为未来的霸权国家，而是旨在平衡各方利益的集体秩序中的一部分。“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第一。我们并没有那么强大”，其中一位受访者说。欧洲将在中美欧三角中发挥特殊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的主导者，而不仅仅是跨大西洋的卫星国。

原有桌子上增加了一个新席位

中国的崛起经常被用一幅有说服力的画面来描述：“原有的桌子上的座位已经坐满了，中国是这个桌子上的新客人。”但这个新来的客人感到被误解了，有时甚至感到不受欢迎。受访者多次强调，中国的努力常被负面解读——即使在多边框架内也是如此。受访者陈述的基调是，中国不谋求主导地位，只想共同塑造世界。

“今天，我们也想提出我们的全球化理念。”

有人批评道，当今的国际架构依然反映了西方的思维模式和主导地位。因此，尽管中国支持联合国，但它认为自己的利益在联合国未被充分考虑，且认为联合国分支机构效率低下。在中国看来，目前还缺少一个能包容所有国家，并让各国依照自己的逻辑开展平等合作的机构。中国的国际倡议应当弥补国际机构一直以来存在的缺陷。“被美国摧毁”的世贸组织就是这种困境的象征。即使联合国的模式目前几乎无法运转或运作不畅，中国也没有企图设立与联合国相对立的国际机构，来将这些倡议机制化。德国在这方面被视为是潜在的“桥梁建设者”，前提是它愿意走出美国的阴影。

主权和盟友

受访者对德国的地缘政治角色有不同的见解。德国一方面被认为是具有调解潜力的“天然伙伴”，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一个过于听从于美国的国家。有受访者说道：“美国军队还驻扎在德国，不是吗？这就使人明白了许多。”这句话与其说是争辩，不如说是无奈。人们要求德国有更多的独立性——不是民族主义意义上的，而是从对全球平衡贡献的角度。多极世界秩序需要主权参与者，不能进行单方面脱钩，而是要有意识地构建“相互依存”的关系。受访者认为军事联盟没有吸引力，他们希望能进行具有坚实外交基础的多边对话。

不信任和脆弱性

在分析性的言辞背后经常会流露出情感上被伤害的感觉。西方对中国的批评——例如关于人权和台湾问题——往往被认为是片

面、虚伪或无视历史的。西方国家总是在批评中国，但对自己的阵营则保护有加。一位受访者指出，在美国这个所谓的模范民主国家，人们可以收买选票。“民主在西方似乎行得通——至少部分是这样，但它并不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在中国，人们变得越来越谨慎：“无论我们做什么或说什么，都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这种克制不仅是出于战略考量，更是一种对尊重与平等对待的深切渴望。

愿望与现实

或许最强烈的动力源于超越霸权的共存渴望。其中一位受访者说：“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可持续的未来。”这不是一个激昂的口号，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提议。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被反复提及。受访者呼吁：“我们不仅要分蛋糕，还要让蛋糕做的更大。”这一愿景把地缘政治因素与道德要求结合在一起。

“中国主张自己的利益，也承认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并努力公正地平衡各方的利益。这并非易事，但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多边主义被重新定义：“允许多边参与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分歧进行严肃的辩论，在此基础上实现互让互谅。”未来的秩序将更多地由关系而不是权力来塑造，因此我们需要新的伙伴关系形式。受访者默默希望欧洲可以在这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的国际参与

中国受访者以自信、内心不安和审慎批评的态度反思中国的国际参与。中国的全球形象并非毫无矛盾，它是一个处在寻求外交定位和内部平衡过程中的国家的写照。

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是采访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受访者对其评价不一。虽然它在外交上可以被视为实力和战略影响力的象征，堪称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但许多人也指出了中国国内还存在的不足之处。“离这里一百公里远的地方，人们连干净的饮用水和厕所都没有。”

“中国的许多对外举措，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内问题。重点显然是国内问题，而我们有非常多这样的问题。”

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道德角度来看，人们对在国外进行大量投资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自己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而政府却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东欧这个“欧洲的前院”投资了上百亿。“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影响不仅受到国际观察家的质疑，也越来越受到中国国内的质疑。

强势外交及其隐患

中国的外交风格在许多受访者看来是个问题领域。“战狼”一词——有些人对外交部官员的称谓——代表着一种新的、咄咄逼人的言论，这种言论在殖民时代的屈辱背景

下可以被理解，但并不总是有帮助的。“过于强势的政策无济于事”，一位受访者强调，“实力与冷静的头脑相结合才会有所帮助。”与此同时，政府被指存在明显的对外沟通缺陷。“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沟通。”语言障碍、战略缺失、管理技能不足——所有这些都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蒙上了阴影。

“我们必须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价值观、共同福祉、一个可以自由发展、引起他人兴趣、吸引顶尖人才的环境，这些都变得越来越重要。”

很多事情没有外界看起来那样经过深思熟虑，往往带有“即兴发挥”和“无能为力”的痕迹。

国际沟通与自我认知

一个贯穿始终的议题是中国难以在国际上恰当地展示自己。中国必须“学会更好地表达自己”。

“善于沟通的人不会外语，懂外语的人又无法很好地沟通。”

中国的复杂性之所以未被充分认识，是因为它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一些人认为，积极开展这种解释是国家的任务。“我们要主动，要抓住机会积极向世界说明中国想要什么。”但显而易见，在外交抱负和沟通效果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承担责任还是越界干涉？

好几位受访者强调指出，对中国的指责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批评中国没有履行其全球责任，今天，人们却说中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绕过联合国，以自身短期利益为导向。大多数受访者对此提出了反驳，并为政府的全球倡议辩护。他们认为，这些倡议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为了寻找原材料和“中国过剩产能”的销售市场，但另一方面也为参与国家带来了实际利益，给这些国家注入了发展的动力。在此背景下，在香港新设立的国际调解院被视为中国对解决国际冲突的贡献。应借助调解机制，以非正式、非对抗性的方式处理国际冲突，平衡各国的正当利益。此外，受访者还强调，除了这些倡议之外，中国也与联合国开展合作——尽管中国认为联合国机构的效率低下。

台湾是地缘政治忠诚度的试金石

在战略诉求和文化不适之间——中国受访者关于台湾问题的表态，展现出一种交织着主权受辱感、战略盘算以及对西方立场的敏锐审视的复杂心态。

务实政治

多位中国受访者对台湾战争的可能性持非常冷静的态度。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战略智慧的标志。

“如果我们发动战争，那我们就太过愚蠢了。”

这种立场是一种在不放弃政治主张的前提下避免军事升级的考量。台湾不被视为一个自治实体，而是中国国家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的利益很明确，即一个中国政策和台湾是首要任务。”统一被描述为一个历史性目标，“即使德国采取强硬措施，这一目标也不会改变。”而且也可以反复听到：“习非常希望收回台湾。”

情感距离

虽然地缘政治评估通常显得客观，但在有关台湾社会的陈述中偶尔会出现恼怒的语言。一位台湾高管到大陆后就变了样，给人的印象是“只想跟大陆做生意，除此之外却看不起我们。”另一位受访者则称台湾方面的言论是“语言歧视”，甚至视其为“中国封建王朝的遗毒”。这些表述透露出一种更深层次的不安——不仅只是对政治划界的不

安，更是对台湾傲慢的自我定位的不安。在部分受访者看来，台湾的这种自我定位根本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欧洲的干涉踩到了红线

受访者对西方介入台湾问题的反应特别敏感。对德法两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他们的反应是：“这不会改变任何事实”。但如果北约向东亚扩张，则将构成“天壤之别”。他们建议德国“不要再发表类似言论”，因为相关言论“会在中国国内传播，从而激起民众的不信任情绪”。信息很明确：台湾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也是衡量西方伙伴政治可靠性的试金石——一块决定对德国信任度的试金石。

乌克兰和台湾——一个危险的类比

人们奉劝不要将乌克兰战争与台湾冲突相提并论。受访者强调说：“两者完全不是一码事。”欧洲对乌克兰的态度与中国对台湾统一的态度反而被以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那些不理解后者的人也别想理解前者。这里暴露出一个深刻的分歧：关于国家完整与国际互助团结之间的关系，关于历史、正当性和道德普世主义的界限。

欧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尊重、困惑和日益疏远之间：欧洲被描绘成一个受重视但日益失序的大陆，其道德主张与地缘政治现实渐行渐远。

变味的价值观

许多中国受访者认为欧洲是一个具有“很高道德标准”的大陆——一个曾经代表人性、秩序和法治的地区。但眼下这种看法变得越来越动摇。受访者谈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往往在地缘政治上会适时出现。特别是对中国的态度——例如在人权讨论中——被认为是有选择性并带有传教意味。一位受访者表示：“欧洲擅长提出美好的概念，但不擅长将其付诸实践。”对许多人来说，这种主张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引发了一个问题，即欧洲是否还能充当一个可信赖的参与者。

消失的影响力

欧洲曾是一个世界权力要素，如今却“只是一个大陆而已”，一位受访者无奈地说道，欧洲的经济影响力正在变小，在地缘政治上，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美国主导”，几乎看不到其自身的战略意图。多位受访者认为欧洲正陷入一种身份危机：既没有全球政治中的独立性，也没有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在外交、调解或稳定方面，“软实力”一词被多次以赞赏的口吻所提及。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软实力”在一个强硬和强权政治重新崛起的世界中显得没有什么分量。欧洲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美丽大陆，但已不再是

决定性的参与者”。

感觉亲近，实质疏远

尽管存在种种批评，但仍能感受到受访者对欧洲的亲近感。欧洲被认为是教育的殿堂、哲学的源泉、文化的圣地。与美国不同，德国和中国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但这种亲近感正逐渐疏离。一些受访者认为欧洲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或者谈到欧洲仍普遍存在“东方主义”。受访者谈到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它将中国视为客观存在，而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一位受访者形象地说：“欧洲往往只在那里自说自话。”在钦佩和困惑之间，欧洲与中国的距离渐行渐远。

安全稳定，但没有愿景

欧盟被视为一个具有稳定作用的共同体——这尤其得益于其制度结构及其从历史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一些受访者承认欧盟对欧洲大陆的和平、福利社会和气候政策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希望能与欧洲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这不是为了对付特朗普，也不仅仅是为了做生意，而是要共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秩序。”

欧洲缺少对未来的愿景。有受访者尖锐地指出：“欧洲只会管理，但不会引领”。人们虽然表达了欧洲可以成为全球秩序的“文明力量”的想法，但真正深信不疑者寥寥。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和连贯的外交政策，欧洲将仍然只是世界舞台上的旁观者。正如

一位受访者所言：“欧洲很重要，但不具有影响力。”

伙伴与导师

欧洲喜欢将自己视为导师，而非平等的合作伙伴，这使许多受访者感到不舒服。这种在道德上高高在上，在经济上犹豫不决的不对称态度在中国越来越引发反感。一位受访者将欧洲描述为“自己不做作业的老师”。在中国，许多人期望的是一个愿意倾听而非说教、对交流而非指定立场感兴趣的欧洲。总的来说，欧洲并没有被拒之门外，但明显感觉到人们希望进行更真诚、更平等的对话。

美国——主要对手

中国受访者的言论折射出对美国看法的复杂情感——既包含向往，也夹杂着挫败与忧虑。这个多重图景中的美国扮演着三重角色，既是文化磁场，也是地缘政治对手，更是阻碍欧洲实现战略自主意识形态的绊脚石。

危险的霸主

在许多受访者眼里，美国早已告别了“好霸主”的形象，正在奉行“自杀政策”。受访者用尖锐的措辞批评华盛顿不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对手，而是要“扼杀中国”，这种说法凸显了人们感受到的经济和科技战的激烈程度。一位受访者猜测道：“美国不想要公平竞争。”但同时强调，中国拥有必要的资源，可以通过自己的发展来应对美国的出口禁令：“我们拥有这方面所需的东西：专业人才、市场和资本。”这种态度混合了自豪和倔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甚至延伸到了核领域，有人问美国是否会对华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战争。人们估计这种概率仅为1%，但前景依然黯淡：“一场持续更长时间的冷战”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场景。

巨大的诱惑

尽管存在种种地缘政治摩擦，美国的文化吸引力仍然巨大。一位受访者略带钦佩地说：“我的学生中有一半去了美国。”这种吸引力主要来自美国文化的全球感召力——从好莱坞到嘻哈音乐。

“媒体报道，尤其是社交媒体，在片面形象的传播扩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对美国的报道也是如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自身的文化政策在国外显得“非常老套”，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美国不仅成功输出了自己的文化，还通过非政府组织“与德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同时却推动了“与中国的关系恶化”。美国的吸引力仍然存在，尽管其地缘政治意图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特朗普使局势更加紧张

许多人提到了唐纳德·特朗普。一位受访者说：“如果没有特朗普，世界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全球秩序。”而另一位受访者则将特朗普的贸易争端视为特朗普家族金融投机的舞台。谈到中国的应对方式时，有人说：

“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中国做出了许多让步和妥协。但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情况就不同了。”特朗普是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象征性人物，即一种不安全政策，这一政策下的一切都变成了安全问题，无论是华为、稀土还是欧洲天然气管道。北溪管道正在成为德国独立自主性的试金石。“每个人都知道美国摧毁了北溪管道，但你们没有人这样说”，一位受访者略带嘲讽地评论道。特朗普不仅仅代表美国，更代表一个变乱交错并想拉着欧洲一起走的美国。

欧洲的独立自主

在受访者的陈述中，欧洲也脱不了干系，但批评往往针对其依附华盛顿。“美国对欧

洲的影响”被认为是中欧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中国不仅受到美国政策的挑战，也受到欧洲追随美国政策的挑战。“欧盟过去本没有那么政治化，美国对华为施加压力后，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一位受访者总结了这种失望。在一些人看来，德国在经济、安全政策和文化层面都特别依赖美国。对这种依赖的批评往往充满了遗憾，但没有贬低之意。

“与德国的冲突主要与美国有关。”

受访者正面评价了施罗德拒绝参与伊拉克战争的立场。“这赢得了我们的尊重。”这是欧洲作为独立行为体，而非霸主跟随者出现的罕见时刻。

俄罗斯——邻国、难题、必修课

在历史创伤、地缘政治桎梏和务实审慎之间：受访者勾勒出一幅不乏矛盾和抵触情绪的对俄关系图景。对欧洲则交织着困惑和期待。

一种复杂的关系

对于许多受访者来说，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是一个沉重的历史遗产，他们既不想摆脱这种关系，也不想不加批判地接纳。有人说这是一种“艰难的关系”，还提到“大片领土被俄罗斯夺走”的往事。即使官方强调关系正常化，这些伤痕依然根深蒂固，但俄罗斯是“邻国”和“核大国”，这一事实必须被接受，部分也是出于国家稳定的考虑。

“我们不想与俄罗斯对立，否则我们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与俄罗斯的友谊听起来好像不是出于信任，而是必要之举。受访者的情绪基调在怀疑、不信任和战略冷淡之间摇摆。

保持中立就像在走钢丝

大多数受访者为“不干涉政策”的官方路线辩护，但也有自我批评的声音：“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不是特别聪明。”一些受访者认识到，中国的这种态度在欧洲被视为机会主义，甚至被认为暗中支持俄罗斯。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乌克兰局势并不像西方希望的那么非黑即白”。将乌克兰战争等同于“后苏联内战”，甚至是“美欧

之间的冲突”，与西方的道德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含蓄地为中国的克制进行了辩护。受访者传达的信息是：那些要求保持中立的人也必须承认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例如，北约的东扩——虽然这是各国自主决定的结果——但在俄罗斯看来就是挑衅和威胁。

犬儒主义、虚伪和欧洲的期望

人们对欧洲的期待越来越不满。下面这句话说明了这种态度：“俄罗斯正在用‘犬儒主义’作为武器，用它来对抗西方的虚伪。”这句话意味着双重批评，既批评了俄罗斯的暴行，也批评了西方的双重标准。鉴于西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和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诉求，要求中国谴责俄罗斯的行为“难以令人信服”。有受访者呼吁多加相互理解：想要更好地理解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应认真对待“中国和台湾的统一问题”。这种表述的背后不仅有对抗情绪，还有对平等地位的渴望。

俄罗斯——地缘政治的现实

多位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在经济上落后，“数量上微不足道”、“主要依赖原材料，没有太好的未来”。中国政策的真正重点在其它方面：本国的发展和繁荣，以及有助于确保这种繁荣的全球影响力。但这正是困境所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就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与俄罗斯目前保持的关系正常化是相对较新的现象，人们不想拿这种关系去冒险。

“在国际关系中，仅靠友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实力才算数，这也适用于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

在许多人看来，俄罗斯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干扰因素，既令人不适又无法回避：“俄罗斯？哦对了，还有它呢。有时是朋友，有时会勾起我们对往日的痛苦回忆。”

5 呼吁“理性”合作



经济是一切合作的重点

在比较优势、务实合作和结构性摩擦之间，中国对德中经济合作有着不同看法。这种合作有时被誉为成功的典范，有时被视为是有待改善的领域。

经济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在许多受访者的表述中，经济被视为是德中合作中潜力巨大的坚实支柱。德国被认为是一个可靠且备受重视的合作伙伴，拥有关键技术方面的专业能力和对质量的成熟理解。这一点在诸如“无论在政治上发生了什么，德国仍然是中国非常好的经济伙伴”这样的表述中尤为明显。德国的汽车工业、机械制造技术以及精准的工艺，与中国的灵活性、发展速度和规模巨大的市场互通有无。这一点在汽车行业尤为明显，质量上乘的德国高科技和几十年机械制造经验与中国的IT优势、发展速度和贴近客户的市场相融合，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完美的匹配。

“德国需要中国，反之亦然。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够，关键技术仍然来自德国。”

在其它领域也有类似的合作潜力。一位受访者对德国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团队协作流程赞不绝口，认为这正是中国目前尤其需要的东西：重点在于提高质量，而非仅仅追求数量和速度。食品贸易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有受访者指出，“奥乐齐（Aldi）”在上海取得的巨大成功，正是得益于德国品质承诺与中国依托信息技术建立的全天候营销体系的完美结合。

互动中的新角色

不容忽视的是，双方在合作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追赶你们，但后来我们在很多领域都超越了你们。”除了信息技术以外，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中国企业对客户需求特别重视的商业意识。一位受访者分享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某个洗衣机厂商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敏锐地了解到，中国消费者有将内衣和外衣分开洗涤的习惯，仅仅一个月后，一款双筒分区洗衣机便迅速推向市场。另一个典型案例是瑞幸咖啡。中国企业家敏锐地观察到，许多年轻的中国女性已不再对星巴克的特殊服务和门店氛围感兴趣，于是他们推出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品质出色的咖啡，并迅速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在中国受访者看来，务实思考和以客户为导向的本地化决策往往更能使经济合作取得成功，这与德国母公司内部或需经过母公司批准的决策形成鲜明的对比，母公司的决策过程通常被认为是犹豫不决的。

寻求公正的合作

许多受访者强调希望建立一种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其中不存在失衡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不谋求在经济上形成单方面的依赖关系。”这句在访谈中频繁出现的话语充分反映了一种明显区别于谋求支配地位的态度——中国希望被视为一个值得信赖的经贸伙伴。中国经济高度倚赖贸易，出于政治目的滥用经济依赖不符合这一点。受访者多次强调，中德双方都可以从合作中获得好处：中国具备执行迅速、推动创新的能力，德国则可提供高端技术和成熟的质量标准。一位

5 呼吁“理性”合作

受访者这样说道：“我们必须开展比以前更聪明的合作。德国提供高质量的技术产品，而中国可帮助德国进入中国庞大的市场。”两国如果携手合作，还能够在三方市场展现更强的竞争力。因此，理想的模式是与当地合作伙伴紧密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共同学习

合作中的一些小故事也体现了文化学习的过程。一位受访者回忆自己早年在中国做生意的经历：“我们的第一笔订单是在十五轮‘干杯’之后拿到的，当时只有市长和我的德国老板还能站得稳。”这样的回顾与当今对专业性和速度的要求形成鲜明对比。

“你们在机械制造方面还有许多专利值得我们学习，但也许中国可以帮助为这些专利插上数字化翅膀。”

双方的学习曲线确实呈直线上升，但相互理解就不那么理所当然了：“对于德国的中小企业来说，在来到中国之前，先了解一下中国非常重要。”而且不是每个德国中小企业都能在中国找到利润丰厚的市场。毕竟中国不只是与德国合作，想要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就必须具有全球竞争力。受访者还指出，德国标准不能总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随着双方的交流变得越来越专业，中国方面对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例如在建筑行业，受访者建议“放慢速度，提高精度”。

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合作

尽管经济共生关系经常被描述得很和谐，但对政治环境的疑虑也是显而易见的。

多位受访者认为，贸易战、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欧洲的谨慎态度是合作所面临的障碍。一位受访者尖锐地指出：“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当第一大经济制裁我们时，我们难道不该团结一致吗？”地缘政治形势本应促使合作，但德国缺乏政治决断。有受访者对政治意识形态阻碍经济合作感到遗憾：“在德国，有很多企业希望与中国进行更多合作。但政客们不想这样做。”因此，中德合作的结构性潜力陷入了经济实用主义和政治谨慎态度之间的紧张泥潭。

文化交流作为桥梁

在疏离与向往之间：中德之间的文化对话看似脆弱，却蕴藏着尚未充分挖掘的巨大潜力，能够在政治舞台之外促进彼此的相互理解。

接触是解药

几乎在所有访谈中，受访者都希望能开展更多的文化交流，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设想，而是针对恐惧、偏见和疏离的有效解药。

“人们必须相见相聚，才能消除心中的恐惧。”

交流应该尽早做起，从儿童和青少年开始。夏令营、学生交流、家庭寄宿、青年乐团——这些都是受访者提到的人际交流的具体方式。不少受访者对德国学生对中国兴趣的下降表示遗憾。签证便利化固然受到欢迎，但这显然不足以弥合双方已经产生的隔阂。受访者的语气介于呼吁和无奈之间：“青少年交流对未来至关重要。”这似乎成了超越地缘政治封锁，实现和平前景的最后希望。

文化的力量

音乐、艺术、电影和体育被认为是在其它层面上实现理解的领域。“这样的交流不通过语言，而是一种灵魂、情感和精神的交融。”这句话形象地说出了对文化的特殊内在力所抱有的信任。

“文化和艺术能特别好地体现不同的思维方式。”

古典音乐在其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德国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音乐家心中的“圣地”。文化交流不仅被理解为相互介绍，而且也被理解为是一面镜子：有些人所擅长的东西可能就是别人想要学习的东西，这就是相互借鉴的潜力。

交流机制与安全空间

许多受访者明确表示，交流不会自行发生。它需要制度保障、人际网络和资金投入。在这方面歌德学院被多次提及——有赞扬声，也有失望和叹息：曾经定期举办的文学交流已被缩减，电影节目也仅限于象征性的“电影周”。与德国的所谓“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只举行过一次活动，秘书处虽然还在，但已徒有虚名。艺术项目通常依赖个人关系，奖学金越来越少，旅行费用越来越昂贵。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被视为典范的成功项目，例如拜仁足球俱乐部在青岛的合作活动，或德中音乐伙伴关系。受访者反复强调，需要通过更多这样的“具体项目”来建立信任。

政治敏感性

受访者觉得交流在政治上也很敏感，要划清受欢迎的对话与不受欢迎的影响之间的界限。只要与官方的叙事不一致，“一切都会立即被抹黑为宣传”，这恰恰说明文化领域有多么脆弱。与此同时，许多人反对将艺术政治化：“音乐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正因为艺术家们经常进行批判性和独立的思考，受保护的交流空间——例如由德国大使馆提供的场所——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一位受访者指出了这种紧张关系：“我们需要世界公民，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几乎所有

5 呼吁“理性”合作

受访者都希望看到政治以外的民间交流，大家普遍相信：信任不是被命令出来的，而是被培育出来的。

体验中国，而不是解说中国

一个不断被提到的观点是：只有亲身体验了中国，才能得出自己心中的中国形象，不能仅凭媒体或他人的解说来获得中国形象。经常有受访者说：“来中国看看吧！”无论是通过旅行、交流项目还是个人接触，那些在中国逗留较长时间的人往往会带着一个不同的、更加正面的中国形象回去。相反，许多德国人从未去过中国，这被认为是一种缺憾。有受访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危险的是那些没有见过世界的人。”对德国怀有情感依恋的老一代人被称为是联系德中两国的桥梁，足球迷、烹饪爱好者或宠物爱好者也起到这种纽带作用。即使是日常的小故事，例如更好的美食、展示“真实中国”的YouTube博主等都有意义。正如这里所看到的，交流不是始于会场，而是从一碗面或一首歌开始的。

教育和研究

在相互欣赏和日益疏离之间，受访者的陈述勾勒出了一个气氛紧张的领域，在这里，交流与合作常因政治壁垒和不信任而受阻。

在德国上大学——令人向往却受阻

许多中国学生赴德留学的愿望未曾间断。德国被认为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学习的殿堂”，特别是因为“大学免学费”。在美国签证政策收紧的背景下，德国被认为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但现实往往令人失望：“去年，有150名中国学生因为没有及时拿到签证而无法及时赴德国留学。”受访者指出了官僚主义障碍、难以找到住房以及在当地缺乏支持等弊端。

“我希望我们能继续相互学习和合作，让双方都受益。”

尽管如此，交流的愿望仍然强烈——无论是来自亲身经历者还是那些朋友子女已在德国学习的人们。

科研合作步履蹒跚

受访者的陈述表明，对德国在研究领域开展合作的谨慎态度越来越失望。技术研究领域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假定的制裁名单和国家安全问题就像汽车的刹车片一样，阻碍了双方的合作。有受访者指出，德国的亥姆霍兹联合会“取消了与中国的许多联合项目”，联邦科技部长出访台湾，这无疑是研究领域合作降温的例证。这种发展趋势使人

难以理解，一位受访者说：“在我看来，意识形态的竞争毫无意义。”尽管中国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例如月球研究），受访者常常感到在其它领域受阻甚至被排斥。

“中国和德国可以在研究方面共同取得很多成就，因为中国现在也有尖端研究。”

一些受访者认为这不仅是政治动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退却：“过去，出国留学受到高度重视。今天，情况正好相反。”

求知若渴与谨慎戒备

受访者的陈述显示，他们对德国科学文化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对这一领域合作的减少感到担忧。受访者认为，中国也可以从德国的教育体系中学到很多东西：“孩子们会学习哲学、宗教和历史，也有时间玩耍。”这种“游戏式学习”的元素得到了积极的评价，法学教育中的方法论也是如此：“我在中国的许多大学都按照德国的模式来施教。”与此同时，许多受访者希望看到德国能更加开放：“德国应该更主动一些，不一定要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咄咄逼人，但起码应该像法国人那样开放。”德国的这种保守有时被理解为是一种战略恐惧的表现：“它害怕这样做会帮助竞争对手。”

发挥文化协同效应，摒弃竞争思维

尽管存在许多政治障碍，但平等交流的愿望仍然存在。一些受访者强调，交流不应

是单行道，德国也可以向中国学习。一个示例性的建议是：借助现代德国计量技术和中国人工智能”可以将西方医学与中国的传统医学结合在一起。这种协同作用可能会产生一种“非凡卓越的组合”。受访者还看到了职业培训或终身学习领域尚未开发的潜力。只要人们不互相排斥，而是保持好奇心，文化差异就不会成为障碍，而是可被利用的资源：“不管怎么样，只要社会交流不停止就好。”

环境保护——要技术， 不要政治

在雄心和清醒之间，德中环境合作存在着一种由钦佩、实用主义和潜意识怀疑交织而成的紧张关系。

德国的环保声誉依然良好

许多受访者表示，德国仍然是环境领域的标杆。诸如“德国是值得信赖的”或“德国也在付诸行动”之类的评价反复出现。饮用水质量和可再生能源的并网管理等受到了受访者的特别赞扬。

“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中国从德国的环保技术中受益匪浅。”

一些受访者甚至说：“我们还没有达到二十年前的德国水平。”不过，大家不仅认识到这种时间上的差距，更把它视为一种机遇：德国成为中国绿色转型的学习实验室。德国的环保能力在政治层面不怎么受重视，但其技术和实际执行情况备受推崇。

实用主义取代意识形态

尽管对德国赞赏有加，但许多受访者阐明了一种独立和更务实的环境政策。“我们仍在为我们的生存和竞争力而奋斗。”这句话明确无误地指出，发展经济是中国的优先事项。“先要活下来，然后再好好活”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这种态度。有鉴于此，某些技术——例如核电或高效的燃煤发电——就不是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而是必要的过渡解决方案。绿色转型并没被浪漫化，而是被

视为经济增长、权力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复杂平衡行为。

谨慎合作

与德国的合作广受欢迎，但有所保留。好几位受访者强调，双方有良好的契合点，特别是在非意识形态领域——例如环境技术、循环经济或可持续金融等领域。但也有人表示怀疑：中国的绿色科技行业“政治色彩浓厚”，非政府组织不起作用，对来自德国的政治指标没有多大兴趣。概括来说就是，虽然中国对德国的环境解决方案非常感兴趣，但对德国的环境政策却持怀疑态度，认为不适合中国。

双向学习

一些受访者还呼吁德国重新思考：德国完全可以向中国学习——例如在电网稳定性或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方面。

“也许德国也可以学习中国的‘向他人学习’？”

互惠学习的理念贯穿在许多受访者的陈述中，他们质疑以往单向的知识输送，并强调指出，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德国的经验，而是需要符合当地具体情况的解决方案，例如为产业集群量身定制的生态解决方案等。

成果与不足

受访者对中国绿色转型成果给出了不同的评价。一方面有许多进步的例子——从垃圾回收到二氧化碳封存，从电动汽车到自然生态修复。另一方面也还存在结构性缺陷：

非政府组织体系薄弱，公众的环境知识不足，环境补贴的效果有限。给人的印象是，这些成绩虽然真实，但也很脆弱，因为这是依赖政治倡导，还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也受到批判性眼光的审视——说得多做得少——这表明人们已厌倦了那些缺少切实行动的口号。

确保生存还是加强竞争？

在许多受访者看来，环境政策与其说是一种伦理责任，不如说是一种战略需求。“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必须把蛋糕变大”的表述揭示了一种经济动机模式：绿色政策作为区位优势。甚至植树也被纳入价格系统，可持续行为也可成为商机。在中国，环境问题并没有被忽视，而是从经济角度重新界定。

向南看——期待与矛盾

在认可、怀疑和合作意愿之间：中国受访者对全球南方的看法就像是一个由实用主义、对西方傲慢的批评和平等合作愿望拼起来的马赛克。

说教还是支持

不少受访者批评德国发展合作所带的“说教式”姿态以及经常与道德优越性连在一起的各种“条件”：“我们是好的，没有腐败，你们是差的，必须与你们的腐败作斗争。”对德国存在的腐败视而不见。在道德上指手画脚不仅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而且也被视为是真诚合作的障碍。

“我们有相同的目标，我们也想打击腐败，但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有所不同。”

中国受访者更看重合作的基本态度——不是说教，而是一起共同学习。

目标类似，路径各异

尽管受访者中不乏批评之声，但对德国发展工作的意义没有根本质疑。例如，一些受访者承认德国“总体上在做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并且在非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差别在于方法路径：德国强调长期规划和能力建设，而中国则更侧重务实的基础设施融资，被形容为“柔而有力，滴水穿石”。德方倾向于“事先把一切都规划清楚”，中方则更喜欢试点项目和灵活适应。这些差异很难弥合，但并非不可相互协调。

要合作，但必须平等

受访者指出了中德在全球南方深化合作方面的机遇和障碍。有人说“潜力巨大”，另有人将这种合作比作是“两个都想穿上更漂亮衣服的姐妹”。

“我们应抓住机会，一起在全球南方国家亮相，并展现我们的责任担当。”

相互尊重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德国带来了经验，中国带来了活力，两者并不矛盾。重要的是双方取长补短，而不是一争高下。正如一位受访者所强调的那样，这需要新的合作形式和社会责任。

新殖民主义、自我责任和适度

在一些受访者的声音中隐约可听到对欧洲过去历史的反思。虽然对“西方实行新殖民主义”的看法在中国并不占主导地位，但一些受访者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仍在延续旧的模式。也有人对过度的发展援助本身提出了批评，无论这种援助来自西方还是中国。一位受访者认为，援助应该受到更严格的控制：“援助资金削弱了各国自发的动力，只有那些真正处于困境的人们才应该得到人道主义援助。”

将合作落到实处

受访者对与德国合作的评价介于务实赞赏、结构性批评和相互学习的愿望之间。受访者指出，这种合作不是浪漫化的理想，而是一种具有很大潜力的共同考验。

多点实用主义，少点原则至上

受访者一再呼吁德国更多地采取务实的解决方案，而不要在意识形态原则上纠缠不休：“请少讲点政治，多做点实事。少谈点理想，多关注点国际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有时显得过于强调规范，而中国受访者则强调结果。以“多年本地合作伙伴”为基础的合作受到尊重，而不是纯粹基于价值或理念的合作。

“得益于德国数十年来对华的投资，我们现在为成功合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事实上，现在应该进入‘回报期’了。”

此外，中方“先快速启动，后细化具体内容”的合作方式，常常与德方“事先进行全面澄清”的倾向相冲突。受访者虽然是在客观地谈论这种差异，但语气中明显带着些许不耐烦。

合作就像婚姻

许多受访者的陈述清楚地显示，合作是否顺畅并不只取决于技术或市场逻辑，还取决于信任、连续性和参与各方对拉近彼此视角的意愿。一位受访者将双边关系比作婚姻：“爱不在于盯着对方细看，相互指责，而在

于一起看向同一个方向。”这种生动的比喻针对的是固有的不信任的风险。一些受访者希望看到更多的直接接触，从政府部门互访到智库交流和民间合作等。过去的“德中同行”活动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有人对发出的邀请没有得到反馈感到失望（例如学术交流邀请），这也表明，合作不仅要有相应的机制来加以保障，而且也必须在人际层面进行维护。

“公正转型”和整体视野

“公正转型”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重要议题——即在迈向可持续经济的过程中确保社会公正。一位受访者强调，“这不仅与技术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人有关”。受访者们意识到，未来合作需要超越传统经济合作的新领域。文化和哲学的共同点也被提及，例如在共同寻找“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答案时。在这样的时刻，受访者发出了渴望更深层次合作的信号，这种合作超越机械工程和专利，是一种关于社会模式、人生目标和全球责任的对话。

合作新思考——“特朗普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有关合作的讨论中，甚至唐纳德·特朗普也被认为是可能的催化剂——尽管是负面的。“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共同应对特朗普。”这显露出一种地缘政治潜台词，即德国和中国为应对不稳定的世界政治而结成一种目标联盟，特别是“德国硬件”和“中国软件”的结合被认为是理想的联姻。这种犀利的表述不仅仅反映了对技术的热情，同时也折射出了中国将自身视为数据强国、作为具有卓越算法国家的自我

定位，同时也表达了对德国工程技术的认可和欣赏。在这种解释中，合作意味着要优势互补，共谋地缘政治，搁置分歧，抓住机会。

总结与展望

结束

访谈发现

几乎不出所料，在分析评估采访内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某些陈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人们经常强调亲自到现场体验对形成自己的判断有多么重要，或者提到中国人民以和为贵的生活态度，其政治角色主要是为了追求人类的共同繁荣。这类表述可以解释为受访者几乎不加思索地采纳了政府的叙事方式，并遵守了相应的红线，这在人权或台湾等敏感问题上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叙事模式大多不是机械地重复，而是融入了许多个人经历、情感联结以及独立的论证和趣闻轶事。受访者将官方叙事与个人不同色彩的观点结合起来，并且经常提出批判性的反问，例如关于西方社会常见的双重标准等。这种对话水准为对固有的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进行反思提供了空间。

看似统一的答案后面展现出来的是一群各不相同、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那位曾在德国长期生活过的女教授，像一位“文化调解人”似地用细微的暗示点出两国的弱点和共同之处；又如那位既为自己的文化根源感到自豪又渴望政治变革的艺术家。一位退休工程师则用讽刺的口吻将德国的缜密严谨与中国的快速进步作比较；而那位举止得体、口若悬河的商务拓展专员则几乎百分百地复述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叙事；那位女企业家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了柏林如何磨砺了她的批判性思维，但同时又为其祖国的政治制度作辩护。一位专家建议参加传统茶道以放慢生活的脚步，但对与德国做生意却马上产生了兴趣。一位德语教师公开谈论了绩效压力和

职场的不稳定性，他没有诉诸任何政治口号，而是将之置于全球性问题的框架中。最后，那位女经理虽然列举了各种结构性挑战，但却倡导一种务实和基于信任的经济关系——而非政治忠诚表态为前提。

在受访者的陈述中可以明显看到一种远超“共识或异议”二元认知的多层思维和视角。

访谈反映了对德中关系的不同观点。毫无疑问，政治叙事贯穿着这种观点，但并不只是被简单地复制。相反，让人看到的是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亲近、理解、困惑和批评，而且始终与个人的经历、各自的社会角色和机构特征相关联。需要强调的是，受访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整个中国社会，而是反映了一个具有国际经验且与德国有某种关联的城市社会群体的自我认知。正是这种定位使他们的观点特别具有启发性：既表达了忠诚也提出了异议，在对国家叙事模式表示认同的同时，也强调了独立反思的必要性。政治框架在受访者的陈述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他们并非被动地接受政治框架，而是会对它们进行转化处理，提出质疑或悄然回避。

情绪信号

无论如何，通过本调研报告呈现的中国受访者观点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目前德方在与中国决策者和合作伙伴接触时会面临什么样的情绪和感受、问题和期望。尽管受访者的态度肯定会因人而异，但下述几点具有共性：

- 对德国和欧洲疏远中国深感失望
- 因为中国不公正、错误和不公平的报道而感到受伤
- 对放弃长期建立起来的友谊表示难以理解
- 拒绝任何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
- 对德国和欧洲无力抵御美国越来越无理的行为以及缺乏摆脱美国自主发展的意愿感到惊讶
- 对“当今德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德国的利益是什么”感到困惑
- 担心如果过度强调安全，即使是与安全无关的合作也将难以维继
- 对德国的精准严谨和工程技术继续保持高度敬意
- 对追求共同利益保持极大的开放性
- 对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德国重新合作，继续发展甚至深化关系抱有一丝希望
- 坚信能够在中国和第三方市场共同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
- 有兴趣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全球秩序
- 基于以往所取得的成就，建立新的自信心
- 清楚地认识到本国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巨大挑战
- 坚信政权更迭无助于帮助中国解决这些挑战
- 在众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多种思路
- 希望增加真正的接触和互访，相互尊重彼此的差异和特点

从中得到的启示

该如何对待这些在访谈中获得的大量信息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需要深入思考和讨论。在当前阶段，与中国完全脱钩似乎既不现实也不可取，但同时又希望减少和避免单方面的依赖关系，这就需要调整战略和重塑依存与合作关系。调研结果为尽早实现战略调整和构建提供了一些参考：

首先，德国应该明确自己的利益所在，并明确要与中国在哪些领域建立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德国自己必须首先决定，是建立尽可能强的相互依存关系，还是追求另一种选择。重要的是德国需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只有这样才能确认构成双边关系基础的共同利益。接受我们采访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国家有自己的利益并追求实现这些利益不是问题，而是很自然的事情。

根据本研究中受访者的陈述，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对话想要成功，首先必须要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意味着接受对方为平等的伙伴。中方受访者表示，优越感、道德说教和无所不知的态度在中国很难奏效，也无法让任何人相信对方的价值观和制度更优越。

根据受访者的期待，德国必须采取更加务实的对华态度。鉴于欧洲坚持的价值观立场和核心思想，这对德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开展此类对话前，必须确认德国是否愿意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受访者认为，德国和欧洲在国际关系方面重价值轻务实的做法只会引发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抗拒——从这些国家不愿参与西方国家提出的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对于我们的受访者而言，在谈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能获得同等的利益。这不仅适用于最受关注的经济关系，也适用于影响全球秩序的议题。在地缘政治动荡及传统联盟和国际机制逐渐贬值的时期，德国必须明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德国和欧洲是“联合”还是“抗衡”中国，这将对全球新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对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德国而言，这些问题极为重要，具有生存攸关的意义。本调研报告无法给出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但是我们认为，双方应该就各自的主流叙事和“核心信念”进行交流，也许，这正是实现平等对话、取得相互理解的基础？

调研方法

（待补充）

“中国人眼中的德国”调研于 2025 年启动，本次调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延续了此前一系列国际比较视野下的德国形象研究（参见 GIZ：《世界看德国 1-3》、《外部视点——国际视角看德国》）。调研访谈于 2025 年 5 月至 6 月进行。

本次调研参考了感知研究的成熟案例，采用质性重构方法。调研小组特别筛选了 45 名来自社会重点领域的访谈对象（包括政治、经济、科研、媒体、民间社会、文化等领域），对他们进行了半结构化、半叙述式的面对面深度访谈。受访者的选取遵循“理论抽样”原则，即样本对象在理论上的相关性：所有受访者都与德国有充分的联系（例如本人在德国的经历、职业或家庭背景等），并且能够从自身的社会角色出发，对德国现状和双边关系作出评判。

每次访谈均有两名调研小组成员参加。访谈时长在 60 到 90 分钟之间，以德语、英语或中文进行，配以中德翻译，并最终形成访谈纪要。访谈根据提纲展开，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开放探索性的导入阶段，受访者可以对德国进行自由联想；随后分主题展开对话，这也是访谈的主要阶段，包含八个预先确定的议题（经济、安全、技术、社会、环境、发展合作、德中关系、全球秩序）；最后是关于未来期望和建议的反思性收尾环节。

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调研小组从访谈记录中共提取了约 1200 条核心陈述，并使用双重编码法，利用电子分析工具按照主题（话题领域）和陈述方式（例如描述、评价、建议）对其进行分类和系统化处理。平均每次访谈可获得约 25 个核心陈述。

数据分析分多层级进行：

开放编码（原话）：初步整理受访者对其感知到的现象所作的陈述，从中提取核心内容并进行初步分类。

主轴编码：按照 30 个实证归纳的编码范式对受访者的陈述进行逻辑关联处理。

整合：基于整个数据语料库对整理结果进行浓缩提炼、核实和语境分析，最后对调研结果进行理论化结构处理并形成文字报告。

调研结果的呈现遵循三层递进式的展示逻辑：

第一层：凝练后的核心陈述，部分为保留原意但进行了文字整理的转述，部分为忠于原措辞的直接引述。

第二层：以间接引语的形式将受访者的陈述整合成文本，并说明相关主题语境。

第三层：设置引导性的章节结构并加入解释性文字，从更高的层面上进行理论性归纳总结。

本报告包含五个核心章节，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当前中国如何看待德国以及中德两国关系这一主题进行了一次“抓拍”式的梳理和研究。本调研报告并不是一项代表性抽样调查，而是经过分析提炼将各种在特定语境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和视角整合在一起，呈现了一幅论证饱满的画像（即使开展更多的访谈也不会得到明显不同的结论）。本调研报告旨在推动有关各方对德中伙伴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倡导人们从多角度解读德中关系。

受访者

政治

- 陈元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方在庆教授，科学史研究
郭丹，国际发展研究
贾建新，中国文旅部文化参赞
王香奕，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杨耀武，国家体育总局
有晓宇，信息通信领域
郑应平，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工艺师
-

经济

- 管轶群，建筑师
何山逸，信息科技
李怡燃，柏林驻华商务联络处首席代表
廖原，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辉，上海乐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丽，金融
汪楚皓，北京盖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执行总裁
夏文欢，北京电子控股电子城高科集团产业拓展总监
张娟，咨询
张晔，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公司上海首席代表
-

教育

- 贲圣林教授，浙江大学联合商学院院长
潘亚玲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邱嵒，科隆大学中国办公室主任
王建斌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谢立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院长
周卫东，教育和文化交流
-

研究

- 程琳，可持续金融
丁纯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胡春春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
张昕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赵志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郑春荣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

社会和媒体

巩婕，出版

侯逸超，凤凰网内容部资讯中心原创部原创
国际组国际主编

黄卫红，中德中英同传

兰吉瑞，中医大夫

杨蕾，中德交流与合作

张丹红，专栏作家、作家

张社蚕，环境保护与节能

文化 / 艺术 / 体育

何健，画家

华先生，艺术家

李宪，艺术启蒙教育老师

王泓教授，青岛梅纽因学校小提琴系主任

杨慧教授，艺术教育

张小芮，策展人、作家

以上信息详细程度因个人数据保护要求不尽相同，受访者中有三位希望匿名。

出版说明

出版者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波恩 / 埃施博恩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代表处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 14 号

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1-13-2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27 5180

传真：+86 10 8527 1405

邮箱：giz-china@giz.de

网页：www.giz.de/china

负责人

Martin Hansen,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东亚区首席代表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东亚处项目组

王弋, 刘楠, 窦涵雯, Piet Derbovenn,

Manuel Holtmann, Astrid Reichenbecher, Jonas Lindner,

Gregor Grossman

报告作者

Dr. Mischa Skribot, LUMIQUE GmbH

Dr. Christoph Beier

设计及印刷

北京卓创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潮星汇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北京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公司注册地
波恩 / 埃施博恩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 14 号
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1-13-2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27 5180
传真：+86 10 8527 1405